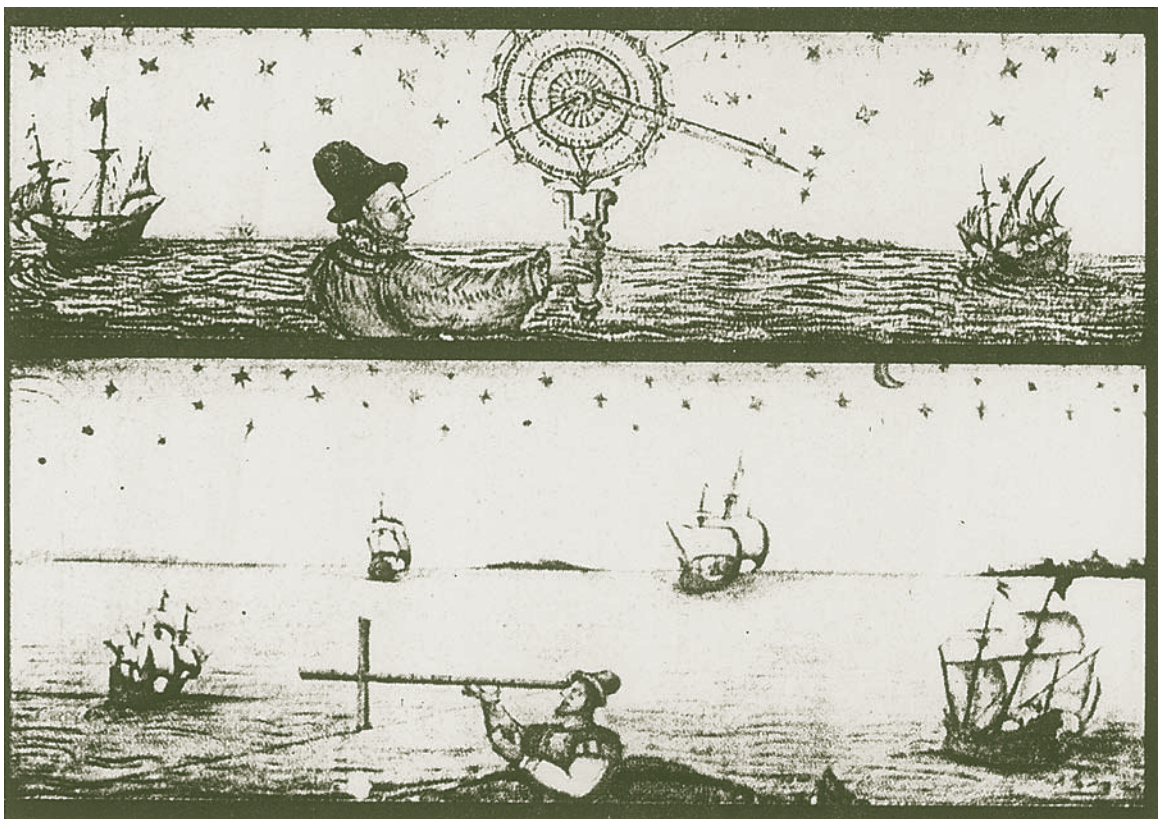


歐洲近代初期的日本與中國觀

對東亞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較

戴默爾*



歐洲人的期盼

今日我定要駛向那棋盤谷（Zipangu）島，
棋盤谷位於那遙遠的黑人之鄉（Mohrenland），
那裡我的表姐正在把奶酪糕燒製，

我得要幫她把那熱奶酪糊攪拌，
否則她就把攪拌器往我頭上砸開兩半……

這是20世紀20年代末一位原蘇台德地區的德國詩人創作的一首兒歌。我還未進小學的時候，便從

* 戴默爾（Prof. Dr. Walter Demel），德國慕尼黑軍事大學歷史學教授。

母親那裡聽到它；而我的母親在她自己還是孩子的時候就知道這首詩了。其中“Mohrenland”指的是非洲，這我不久才搞清楚，“Mohr”是對黑人⁽¹⁾的一種舊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稱呼含有褒義，現在已不太見用。早在1960年左右，雀巢康采恩下屬公司 Sarotti 生產的平板巧克力就是由一個身着東方長袍的矮個子黑人作廣告宣傳的。但 Zipangu 是甚麼呢？或許是一個20世紀早期德國兒童文學作家虛構出來的童話王國，那裡還住着一位女妖。直到很長時間之後我才知道，Zipangu 是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繞道馬來西亞帶回歐洲的中國方言對日本的稱呼。⁽²⁾馬可·波羅的原稿被多次抄寫，在這一過程中名字常常抄錯則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就出現了類似“Zipangri”這樣的名字來指稱那個在歐洲人看來位於世界最東方的國家。⁽³⁾

眾所周知，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描述遠多於日本。我們暫且不論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不過據他自述，他確實從未踏上日本的土地。⁽⁴⁾關於他的這些報道開始祇是被人們當作奇談怪論以供人們消遣的謊話，隨着時間推移，在15世紀才漸漸被歐洲學術界接受。我們知道，克里斯多夫·哥倫布 (Christoph Kolumbus) 也有一本有關這方面報道的小冊子，毫無疑問，那本至今仍保存在塞維利亞 (Sevilla) 的小冊子書頁邊上的註釋大部分為哥倫布親手所寫。近來的研究已從多方面證實了這些來自中世紀的報道所含的深刻意義：同瓦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一樣，哥倫布也期待在“印度”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怪物：獨腳人，額頭上長着一隻眼睛的生物等等。因此，當這位美洲的發現者起初對當地土著人的描述，不祇是關於遍佈黃金的日本還有關於野蠻人的描述表示懷疑時，人們感到更多的是驚訝，而非覺得理所當然。哥倫布不僅對馬可·波羅的文章中提到東亞財富的地方作了批註，日本人和野蠻人的一致性或許至少也是鄰近關係亦令他深深困擾。從馬可·波羅所描述的哥倫布中得知，在 Zipangu 有大量的黃金，皇帝的宮殿完全用黃金覆蓋，大廳的屋頂以及許多桌子都由黃金製成；但同樣也是日本人，卻會殺掉被俘擄的交不起

贖金的敵人，然後同朋友親戚一起把他吃掉。在歐洲人眼中，天堂與最可怕的蠻荒在遠方特別是在遠東從來都是緊密相聯的。⁽⁵⁾

最初相遇和各種相異的認知

1492年歐洲人到達美洲，1498年到印度，約1514年到達中國，1543年才到達日本。⁽⁶⁾直到18世紀才有一些消息顯示，古代作家筆下流傳下來的怪物似乎存在着。一個叫亨利·哈德遜 (Henry Hudson) 的人在17世紀初曾尋找從東北和西北方向通往傳說的契丹之路。⁽⁷⁾契丹和中國北部，所指乃同一地方，這在當時祇能通過耶穌會士的報道得到些許證實，儘管在更早的時候一些觀察者已經推測到了這一點，正如日本和 Zipangu 的關係一樣。⁽⁸⁾1543年，三個乘船遇難的歐洲商人或者說海盜⁽⁹⁾在種籽島 (Tanegashima) 登陸時對日本所懷的期望已在發現美洲和發現日本之間的半個世紀裡大大地降低了，當時他們所見的景象必定令他們驚歎不已，正如六年後的傳教士沙勿略 (Franz Xaver) 那樣。⁽¹⁰⁾

1514年，經歷了起始階段的一系列誤解之後，歐洲人與中國人在廣東進行的首次接觸還是非常成功的。而當時那些葡萄牙人所表現的具有攻擊性的態度卻很快招致北京朝廷的不滿，以至於1521年他們便不允許在中國停留了。那些葡萄牙人的報道者並未覺得中國人的反應不可理解，儘管他們當然也對數十年來中國人不肯接受歐洲人恢復雙方接觸善意企圖的行為持批判態度；相應地，那數十年中國人給歐洲人的印象一開始是不明確的，稍後則是中立友好的。⁽¹¹⁾從1585年開始，有關中國的新資訊才更多地傳播開來。

與此相反，在日本的耶穌會士沙勿略與他的同伴和繼任者寫的信最遲從1552年起就已經大量付印了。⁽¹²⁾與“印度的耶穌使徒”進入中國的企圖近乎絕望並最終失敗以及其他傳教士直到1583年在此事上也一再失敗的同時，沙勿略已經在他與日本人的最初接觸後寫下了這樣的話：日本人是人們至今所見到過的最好的民族。之後他表示，中國人和日

本人都是白皮膚，他們感覺敏銳、求知慾強，前者在“理解力程度”方面還要勝過日本人。⁽¹³⁾對此，1579年開始擔任耶穌會巡視員的范禮安（Valignano）認為，日本人在許多方面不僅勝過亞洲的其他民族，甚至也勝過歐洲人，而范禮安並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傳教士。廣為流傳的《印度史十六卷書》（*Historiarum Indicarum libri XVI*）的編纂者馬菲（Giovanni Pietro Maffei）也同意這種觀點。⁽¹⁴⁾事實上，儘管也會有一些問題和挫折，在日本的傳教事業，總體而言，直到1587年，甚至到1612-1613年，一直是很繁榮的。⁽¹⁵⁾在此期間，日本改信天主教的人數也達到了頂點，至少有三十萬人，這一數字與近代初期傳教時間更長、人數更多的印度和中國改信天主教的人數不相上下。⁽¹⁶⁾

當然，傳教事業的成功並不是歐洲給予一個非歐國家重視的唯一原因。早在1585年，也就是耶穌會士還未涉足中國之時，第一部有關中華帝國的權威著作——奧斯丁會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González de Mendoza）編纂的《大中華帝國風物與習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就出版了。這部書在一個世紀之內就用不少於七種語言發行了至少五十五版。⁽¹⁷⁾同一年，四位接受過洗禮的日本貴族子弟作為公使館員到達羅馬，當時就此出版的五十五部著作在大眾傳播方面取得了與上述事件堪相匹敵的成功。⁽¹⁸⁾

此外，廣為流傳的亞洲傳教團的《年報》（*Litterae annuae*）的敘述重點也在日本⁽¹⁹⁾，到1585-1640年間對兩國的表述在信息量上才達到相應的平衡。那之後直到1800年，由於日本的閉關鎖國，關於這個日出之國的報道就遠遠少於中國了。此外，新資訊的主要傳播者在兩國也有了根本的不同。之前，在兩國都是由天主教神職人員——傳教士或書籍編纂者來擔當這一任務的，此後直到18世紀末在中國的情況一直如此；在日本則是由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的新教普通教徒接替了這一工作，其中有英國人、德國人以及瑞典人，他們對外國文化的知識大多少於自主活動的傳教士。⁽²⁰⁾1669

年，孟他努（Arnoldus Montanus）總結了不同時期來自荷蘭人以及耶穌會士的原始資料，他的看法至少與范禮安的看法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認為，日本人在“政治理論／戰爭行為／社會關係及經濟方面，不亞於”任何其他民族。（*die Japaner hätten keinem anderen Volk, in Staatskunde / Kriegstahten / im Bürgerlichen umgange / und was die Haushaltung betrifft / zu weichen nöhtig.*）⁽²¹⁾與此相對，從天主教的角度看來，人們所能做的祇是，紀念1597年以降為了天主—基督信仰而獻出生命的殉教者。⁽²²⁾

這就引出了宗教與理性之間關係的這一問題：這些人能夠“很好地掌控國家運行，對各種藝術都感覺敏銳”，同時他們卻是盲目的偶像崇拜者，這一點令最初的報道者們感到非常驚奇。⁽²³⁾儘管如此，傳教士們還是堅定地抱有這樣的期望：正因為東亞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們是很容易改信基督教信仰的。⁽²⁴⁾當這些期望被證實了祇是幻想時又會是怎樣的呢？或者東亞人並非歐洲人原來所想象的也是理性的，或者基督教信仰並不符合理性原則。——18世紀時這兩種結論都曾被提出過。

最初歐洲人能夠得到的有關日本人以及較少的關於中國人的看法是相當準確和正面的。令他們驚奇的是，這個民族既是開化的有教養的，同時又是極為陌生的。耶穌會士路伊士·佛羅伊士（Luís Fróis）1585年在一份目錄冊中列舉了歐洲人和日本人之間的相對之處，“他們的許多習俗是這樣的怪僻、陌生，並和我們的習俗相差如此之多，以至於似乎令人難以置信，有着這樣的制度（*policia*）、充滿如此活力精神以及擁有這樣的自然知識的人們竟然與他們是如此的不同。”⁽²⁵⁾政治理論家伯特羅（Botero）和書籍編纂者馬菲也同意他的觀點。馬菲認為，日本人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竟與歐洲人如此不同，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他稱日本人——後來這點也常常被研究⁽²⁶⁾——是與歐洲人“在道德上立場相對的人”，並列舉了兩者之間的許多不同之處，從所喝的水溫到喜愛的牙齒顏色——日本人習慣於把牙齒塗成黑色。⁽²⁷⁾他的一位修會同事勞倫索·麥西亞（Lourenço Mexia）甚至認為：“日本人與

所有其他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至於超出了人們能夠想象的範圍；這一點是如此突出，我寧願說日本人是另一個種類的人，如果大自然中存在着不同種類的人的話。”麥即亞在他寫給孔布拉（Coimbra）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寫了上述這些話，當時他已經結束了在日本的多年停留，而在澳門——一個雖然由葡萄牙人建立，卻一開始中國居民就居多的城市——居住了一年多了。⁽²⁸⁾ 1736年，耶穌會的另一位書籍編撰者夏洛瓦（Charlevoix）認為，日本人的優點所在正是中國人的缺點之處，反過來也是這樣。⁽²⁹⁾ 著名的旅日旅行家恩格爾伯特·肯普費（Engelbert Kaempfer）甚至把這種相對立的情況作為支持他觀點的一個證據，用來解釋為甚麼日本人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儘管它的“風俗習慣、藝術以及科學技術都來自中國，正如當初的羅馬之於希臘”⁽³⁰⁾。

歐洲的報道者不祇注意到了其自身與東亞人之間的區別，還注意到了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區別。這就引出了一種理論：日本人來源於中國的叛亂者；在他們被驅逐出大陸後便決定，要盡可能地與他們的父輩不同。⁽³¹⁾ 這又表明，歐洲人、中國人和日本人似乎處於一種三角關係之中——他們中之兩者往往會共同具有一種特性：坐在（至少還有）椅子上（而不祇是坐在小凳子上）以及高桌旁，而不是像日本人和穆斯林那樣蹲着或盤腿而坐，是歐洲人和中國人的共有習慣⁽³²⁾；騎士道德（“騎士精神”，武士道⁽³³⁾）的存在是日本人和歐洲人值得注意的共同點；在宗教觀念⁽³⁴⁾、飲食習慣（使用筷子）以及譬如說外貌方面日本人又與中國人相一致。⁽³⁵⁾

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外貌

因為我在其它地方談到和寫過上述觀點，這裡請允許我祇是簡短地闡述這一內容。⁽³⁶⁾ 歐洲近代最早提到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貌的資訊中對這一問題的描述，之後很長時間成為了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意大利人科薩利（Corsali）在1515年寫的一封信

信中對中國人的描述是：“他們非常勤奮，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面容粗糙，眼睛很小。”葡萄牙船長歐維士（Jorge Álvares）1547年對日本人的描述是：“中等身高、身體結實、工作非常賣力，是長相好看的白種人民族。”⁽³⁷⁾ 門多薩對中國人的描述也與此相似，除了頭頂不蓄髮而導致髮式不同外⁽³⁸⁾，日本人在外貌上與中國人並沒有甚麼區別。他甚至發現北方的中國人要比南方的中國人長得高。儘管東亞男人的面貌毫無疑問地並不符合他的（也是當時歐洲人普遍的）審美標準——苗條、大眼睛、鼻子突出以及鬍子形狀線條清晰，但他仍認為他們體格健壯，外表看起來令人愉悅。⁽³⁹⁾

東亞的婦女就令歐洲的報道者們——當然都是男性——喜歡得多了。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認為年齡25-30歲的中國婦女都非常漂亮，年紀再大的婦女就很醜了。1656年一位荷蘭駐中國公使館成員紐霍夫（Joan Nieuhof）對此解釋道，年齡較大的女兒們祇被允許吃她們所能消化吸收那麼多的食物，這就是她們保持身裁苗條漂亮的原因。令人驚訝的是，除了留長指甲外，東亞人還留有這樣的風尚——女孩子，至少是出身於高貴家庭的女孩子從幼年起就要裹腳，目的是以後她們的腳能夠盡量地小，走起路來很輕柔。⁽⁴⁰⁾ 利瑪竇（Matteo Ricci）以及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把這一給婦女行走帶來嚴重障礙的風尚理解為聰明男人的一項發明，為的是把婦女困在家中。事實上就我所知，漢語中的“安”字就是由“女”和“家”字各部分組成的。無論如何，一些歐洲人對這一“聰明”的風尚大加贊賞。⁽⁴¹⁾ 日本婦女據稱“身裁非常勻稱，膚色很白，非常討人喜歡並且很溫順”，此外，除了娼妓和皮條客外，日本婦女還是非常好的家庭主婦，她們的丈夫可以因她們的任何過錯殺死她們而不受到懲罰。⁽⁴²⁾

在這一時期，中國人和日本人是“白色人種”這一觀念產生了巨大影響。與對深色皮膚的印度人不同，對中國人和日本人，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更支持採用一種適應性的傳教策略（調和策略）以及培養本土教士來開展傳教事業。⁽⁴³⁾

性格和風俗

就性格和風俗而言，這兩個民族給歐洲人的感覺首先是非常勤奮。⁽⁵⁰⁾然而，啟蒙運動者雷納爾（Abbé Raynal）在《哲學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中指出，這一正面特性本身卻存在着問題。他分別從“贊揚者”和“誹謗者”的角度對中國的情況進行闡述。在書的最後一部分提到了這一說法：中國人確實是這個世界上最勤奮的民族，但這是中國人口過多的必然結果，過多的人口還使中國人無暇發展更高級的情感。⁽⁵¹⁾——往後這一論點被人們一再地研究、討論。

根據歐洲人的描述，東亞人不僅對工作從不叫苦，還毫無怨言地承擔生活中的其它勞累。這點我們可以看一下馬菲（Maffei）對日本人的描述：“對於生活中的種種艱難——饑餓、焦渴、高溫、嚴寒、熬夜以及身體上的疲勞，他們都以令人欽佩的耐力忍受了下來。即便是在最寒冷的冬天，新生兒也會被立刻帶到河中去洗澡。”⁽⁵²⁾日本人通常被描述為非常自律、驕傲、謹慎、有禮貌、因極其看重榮譽而容易感到恥辱、容易滿足（至少在飲食方面如此），並因此而健康長壽。在這之後，厭惡遊戲、誠實、非常樂於助人、好客、對朋友忠實、求知慾強、但對於或多或少的裸體並不感到羞恥等特點也被歸入到了日本人的性格之中。⁽⁵³⁾下面是對日本“年輕的公使館員”的描述，他們“遠不像所有年輕人那樣／狂妄不羈嚮往自由”（weit von aller Jungen Leuth / frech vnd freyheit）。甚至“普通人／手工業者／領取日工資的僱工／也是……／謙虛且正直的”（der gemeine Mann / Handwercks Leuth / vnd Tagelöhner / sein ... / bescheiden und erbar），“他們表現出這樣良好的禮儀習俗／就像他們長時間／受到宮廷教育一樣”（so guoter Höflicher Sitten / als weren sie lange zeit / an vnd bey einem hof auferzogen），這對小孩子也適用，他們不說髒話，而是“優美且友好地”（holdselig vnd freundlich）彼此相待。⁽⁵⁴⁾日本人對自己的孩子也“體貼入微”，他寫道，即使孩子整夜哭鬧，他們也無半句怨言，

然而在中國南方，特別是在廣東省生活的人卻被描述成是棕色的。因為長久以來歐洲人都相信，住在離赤道越北方的人⁽⁴⁴⁾，膚色就越淺，於是中國中部居民的膚色有時便被認作是黃色的，也就是“白色”和“棕色”的過渡。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長崎居民。對此荷蘭人孟他努曾談到，他們“與其他印第安民族相比／皮膚較白／但與歐洲人相比／則膚色較黃／並且不具備富有生氣的顏色”⁽⁴⁵⁾。醫生恩格爾伯特·肯普費也強調“日本國不同省份的人在外貌上是有明顯差異的”，然而他卻認為，日本人“整體上（特別是日本列島上的普通人）矮小強壯，皮膚是棕色的”，他們的眼瞼很厚，從而顯得眼睛細長，鼻子卻是相當扁平的。⁽⁴⁶⁾但對膚色問題的描述，正如人們所認識到的那樣，這一觀點並不具有代表性。迪奧戈·杜科托（Diogo do Couto）就認為，日本人要比中國人“更白一些”。⁽⁴⁷⁾無論如何，早在1735年，針對那些廣東人膚色為“棕色”的報道，有關中國研究性權威著作的作者，耶穌會士杜赫德（Du Halde）就提醒他的讀者避免這種錯誤認識：“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居民面部的膚色，並不是像某些人判斷的那樣，原本就如同我們所見的那般。事實上，在這些省份由於常年高溫，人們的面色才呈現出被陽光曬過的黝黑和橄欖色。但是其它省份的中國人生來就和歐洲人一樣白。”⁽⁴⁸⁾

從我們所能得到的資訊看，直到18世紀末，絕大多數見過中國人的歐洲人都認為，除了廣東人外，中國人的皮膚是白色的。⁽⁴⁹⁾從那時起，歐洲人對自己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日漸驕傲，因此便不再願意把東亞人視為是與自身平等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另一種觀念便在歐洲逐漸推行開來——東亞人擁有另一種膚色，也就是黃色，於是中國人和日本人便被解釋為“黃種人”的成員。種族主義的產生，對抹黑這兩個民族在歐洲的形象產生了很大影響；而在這之前，他們的性格和風俗，長期以來在多方面都是受到贊賞的。

更不會打孩子：“人們說／理解能力會隨着時間積累而增長；良好的禮儀在時間的薰陶下自然便會形成：孩子們在良好的言詞和友好的指導下成長起來便也不會出錯”（sagen / der Verstand komme mit den Jahren; und gute Maniern nämlich werden schon mit der Zeit von sich selbst folgen: Also daß die Kinder nicht anderst / als mit guten Worten / und freundlicher Unterweisung aufgebracht werden），其結果便是很小的孩子就已經“明理懂事、謙虛樸素……如同大人一樣”（verständlich und bescheiden... als wann sie alte Leut weren）。（⁵⁵）恩格爾伯特·肯普費認為，這整個國家可以稱得上是一所“教人禮貌和良好習氣的高等學校”（⁵⁶）。

旅行者們在中國也發現了這種對於他們來說完全陌生而在中國卻廣泛流傳的禮俗。孟德斯鳩（Montesquieu）把這理解為由上而下推行的使得國民遵守紀律的宣傳手段。（⁵⁷）這些禮貌和禮節較少用於日常生活之中，更多的是用在宴請時。傳教士們一開始就發現，在這個國家人們不能開門見山提出要求（⁵⁸），但這些繁冗的禮儀，特別是那些官員們要認真遵守的禮儀，有時令他們感到非常厭煩。單單是宴會就座，就是一件很耗費時間的事情，因為沒有人想讓別人以為自己很狂妄而首先入座。（⁵⁹）其中的許多禮儀讓歐洲人覺得虛假和可笑至極，譬如一位官員在被任命一個新職位時，還要寫一份表示拒絕的材料，儘管他內心急切地希望自己能不出意料地坐上那一職位。（⁶⁰）

而中國人總是相互贈送禮品，禮品的數量往往很大而且其中一部分完全是奢侈浪費，這在歐洲人看來簡直就是一種犯罪。與同時代的歐洲人不同，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自己確切的出生年份、日期和時辰，並在生日那天期待朋友和下屬會送禮物給自己。（⁶¹）為此，他可能還會在一家適合這種場合的飯館訂下與身份相符的酒席，在極端的情況下，這酒席可能會持續十天之久，並伴有音樂及曲藝表演以活躍氣氛，同時揮霍掉大量錢財（⁶²），席間有時會提供百種以上的菜餚。（⁶³）紐霍夫並無顧忌地就一次組織得很好的奢華宴席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是：

“在異教之中難道也有這些？我們置身於天堂了。”（Gibt es dies im Heidentum? Wir sind im Paradies.）（⁶⁴）然而龐迪我（Pantoja）卻對一次顯然規模小得很多的中國宴席發表了這樣的看法：這似乎並不是為了吃飯而安排的，盛着菜餚的容器是那樣小，以至於人們吃上四到六個小時，最後卻還要餓着肚子回家。（⁶⁵）而一致的看法是，在這種場合，中國人總是要大嚼一番。（⁶⁶）

還有一點不容置疑的就是，與上層社會的人正相反，東亞的平民百姓主要以大米、高粱、蔬菜等草本植物為食，並且常常是不夠吃的（⁶⁷）；另外，滿族人並不遵守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餐桌禮節，紐霍夫就舉出了韃靼人吃半熟豬排的例子來解釋這一點。（⁶⁸）奧古斯丁教團的教士拉達（Martín de Rada）把遠東人對筷子的嫺熟運用看作是“有些骯髒”的（⁶⁹），這或許是由於要把筷子插入米飯中或吃麵條時發出聲響的緣故。（⁷⁰）然而祇有拉達持這種觀點，其他所有作者都對這種不用手指直接抓取食物的做法表示贊賞，並視之為講衛生的榜樣。通常在中國以及在日本的宴席上，每個客人都有一張自己的餐桌，桌面鋪上價值不菲的桌布，甚至讓利瑪竇和金尼閣（Ricci, Trigault）聯想到了聖壇枱布。（⁷¹）從報道中可以看出，部分東亞菜餚非常符合歐洲人的口味，而另一部分卻不怎麼讓他們喜歡，特別是當他們發現菜餚中常常沒有肉，更主要的是竟然缺少葡萄酒的時候。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的法國外科醫生梅克林（Merklein）就認為日本米酒有一種“臭蟲”（Wandläuse）的味兒。（⁷²）無論如何，加龍（Caron）還是稱贊日本人酒後從不打架的美德，因為“他們喝醉後”，每個人都會躺下睡覺，“直至酒醒”。（⁷³）

除了飲食問題之外，人們還注意到兩個國家都“非常的乾淨”，不論在街上，還是在家中。（⁷⁴）至於在個人清潔問題上，東亞人就要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人了，這從他們如此頻繁的洗澡次數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而這一點常常令歐洲人驚訝不已。（⁷⁵）在歐洲的報道者們看來，那裡的衛生狀況總體上也要好於他們的家鄉，因為善於經商的中國人以及日本人還會把人的排泄物當作肥料賣掉（⁷⁶），這種保持

清潔的好方法，當時的歐洲人似乎還不知曉。眾多的船隻祇是用來載運紙張，這令曾德昭極為詫異，並試着解釋這些紙張的用途，它們被用來“（這裡請允許我這樣說，因為到處見到這種引人注目的有遠見地使用這種物品的景象）保持廁所清潔，這在每個家庭中都很普遍。人們在街上和商店裡賣這些紙張，卻絕對不允許在上面寫字，因為這被認為是一種褻瀆。”⁽⁷⁷⁾而以自己的文明為驕傲的歐洲好像常常忽略了這一點，中國人似乎不祇發明了普通的紙，還發明了衛生紙，類似的情況也適用於手帕。“他們用一種相當柔軟又有韌性的紙來擦鼻子”；同時代的彼得·芒笛（Peter Mundy）對日本人的這種行為感到很是驚訝，“用過之後就把它們當作髒物丟掉”。⁽⁷⁸⁾

在歐洲人看來，東亞人，主要是東亞男人似乎在性的傾向上很是荒淫：男色⁽⁷⁹⁾和賣淫在日本普遍存在。對於這些觀察者來說，貧窮的父母為了錢而把女兒賣作娼妓並不是甚麼秘密；引起他們注意的是，人們從不把娶一位這樣的姑娘當成是一件恥辱的事。⁽⁸⁰⁾歐維士（Jorge Álvares）寫道，與在伊斯蘭國家不同，在日本按照法律男人祇能娶一位妻子，但是富貴人家卻可以擁有很多侍妾；另一方面，令這位葡萄牙人感到驚奇的是，表現良好的日本家庭主婦卻可以不經特別允許就離開家去她想去的。地方。⁽⁸¹⁾但17世紀就有報道顯示，丈夫們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受拘束，而那些完全依靠她們丈夫的家庭主婦則需要“很大的忍耐”，大名的夫人也祇能一年一次坐轎回家去探望親戚。⁽⁸²⁾日本當時的這種情況，至少在上層社會，與中國是相同的。在那裡——或許不是在整個中國，也可能不適用於鄉村地區——一位原來正派的婦女是不該在街市上被人看到的，如果她必須離開家的話，即使是一位平民家的女子也要坐在封閉的轎子裡被人抬着走，以便她的丈夫能知道自己的妻子拜訪的人是誰。通常，一位婦女過着完全深居簡出的生活，祇有她的丈夫才能進入她的房間，即使是要懲罰兒子的公公（父親對兒子一直保有這項權力，即便兒子早已長大成人）也不能進入；那裡是丈夫的避難所。⁽⁸³⁾

婦女與男性的世界是嚴格分離的——祇有婦女彼此在一起時才是自由的。⁽⁸⁴⁾但在所說的韃靼人中，情況就不是這樣的了。紐霍夫報道，他這位原荷蘭公使就曾被一位貴族韃靼婦女邀請到家中做客，他注意到，在接待他時，這位地方長官的妻子“比她丈夫說得還要多”。⁽⁸⁵⁾紐霍夫作為他那個時代的歐洲人當然覺得這是不合禮儀的，畢竟近代初期中國政治和社會規矩中的宗法制特徵正是許多歐洲人心目中的榜樣。

相反，中國人被認為祇在極低的程度上擁有真愛和榮譽感——日本人則正與此相反。⁽⁸⁶⁾隨着英國在東亞的商業參與越來越多，從很早的時候起，關於中國人性格的消極描述就在英國佔了統治地位，也就是指中國商人愛欺詐、放高利貸的形象。⁽⁸⁷⁾1625年，撒母耳·珀切斯（Samuel Purchas）就把一句格言用在中國人身上：“欺騙是一種智慧（Lying is prudence）”。⁽⁸⁸⁾作為書籍編纂者，他判斷的依據當然是傳教士們的報告：林斯霍騰（Linschoten）認為中國商人“感覺敏銳”。紐霍夫按省份不同對中國人的性格作了區分：江西人狡猾，山東人粗笨，南京人比較坦率並且誠實。⁽⁸⁹⁾耶穌會士曾德昭則對中國家禽商人卑鄙狡猾的行為很是憤怒，他們“把鵝鵝的胸脯肉挖出來，用其它的東西把空缺的部分填堵上，再用嫺熟的技巧把剛才用來挖肉的切口縫合好。如果買主的眼睛不十分敏銳的話（……）他就祇能得到羽毛和骨頭了。”把一匹老馬灌醉充當年紀輕的馬，這種情況在歐洲也是有的，但是，曾德昭繼續寫道，“過份的是，他們還把馬塗上新鮮的斑點和自然的顏色，挑選在黃昏和黎明看不清楚的時候賣掉”，這在曾德昭看來就是一種極為惡劣的行為了。⁽⁹⁰⁾

在歐洲有關中國的最早的專題論著中⁽⁹¹⁾，就已經提到了中國商人欺詐時用的一種固定道具：多種秤和兩種秤砣。孟德斯鳩稱中國人為“世界上最大的欺騙民族”，他曾讀過中國商人使用三種秤的情況：一種自己用，一種給普通的顧客用，還有一種給特別小心仔細的顧客用。但他也提醒人們注意，由於中國經常發生饑荒，對於中國人這種“難以想象的對

利益的追求”——傳教士麥哲倫（Magalhães）也提到過這點——不應以歐洲的道德標準來衡量。^{（92）}但在這一問題上，孟德斯鳩的看法是相當孤立的。主教費奈隆（Fénelon）就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慕虛榮、最迷信、自私自利、不公正並且愛說謊的民族。^{（93）}哲學家盧梭（Rousseau）最終也認為：“（……）沒有他們未曾掌握的惡習，沒有他們還不熟悉的違法行為。”^{（94）}

盧梭的看法具體地否定了尤其是以伏爾泰（Voltaire）為代表的中國觀。伏爾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和平幸福的國度，那裡在明智的法律和真正的寬容精神的輔佐下，由自然神論哲學家統治着。盧梭卻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在他看來，野蠻的韃靼人佔領中國的事實，正是中國人的智慧和科學知識不能克服其自身的弱點、激起其愛國熱情和勇氣的確證。在這一問題上，他對日本人卻沒有異議，特別是當一些作家指出的日本人“憂傷”的一面的時候——日本人喜愛觀察自然，喜歡孤獨，看重那些在歐洲人眼中不值錢的舊物，卻輕視寶石和首飾。^{（95）}

軍事道德和能力：勇氣與國防意識

令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的武士心態。歐維士在關於日本的報道中寫道，日本的男孩子從八歲起就要學習舞劍。^{（96）}日本不僅極為經常地被描寫成出色的射手^{（97）}，還被看作是不怕死的人。對此，歐洲人一方面很是贊賞，另一方面則把這解釋成為因為缺乏對神的敬畏才會有的行為。^{（98）}

相反地，中國的士兵並不勇敢：“（……）中國人並不是戰士”，16世紀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寫道：“除了戰爭經驗很少之外，他們的膽子也很小，武裝也較差，砲兵更是極為缺乏。”^{（99）}門多薩（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在他關於“韃靼人的戰爭”的著作中對中國人在滿族入侵時的失敗解釋道，中國人從天然的資質看，包括體力、勤奮及毅力，本是天生的戰

士，但是他們內部不團結，並且——除了在邊疆省區外——他們的能力已經被長期的和平及生活中的享樂削弱了。^{（100）}

對於16世紀的歐洲人來說，真正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兵士外，中國人並不攜帶武器，他們看重文德更勝於武功，而且他們顯然根本就沒有向外擴張的計劃。有爭議的是，人們究竟是應該把這看成是一種睿智的和平行為，還是把這歸於樸素的膽怯。^{（101）}葡萄牙人徐日昇（Pereira）曾被長期關押在中國的監牢中，正是他制定了第一個以相對較少的兵力征服人口眾多卻武裝薄弱的中華帝國的計劃。^{（102）}在16世紀80年代的馬尼拉（Manila）和馬德里（Madrid），這種說法得到完全的支持。^{（103）}或許是由於對暴力探險的厭惡，西班牙神職人員門多薩和龐迪我以及官方印度史作者特爾德西拉斯（Herrera y Tordesillas）都致力於宣揚另一種觀點，中國人雖不能說就是勇敢的，但也是守紀律的並且隨時準備着進行自我防衛；此外，從理論上講，中國人也有能力進行海外軍事考察，祇不過他們並不準備那樣做罷了。^{（104）}

同一批作家中的另一部分作家對中國人的描述卻與上述情況不甚相符，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一點騎士精神。龐迪我寫道，中國人並不像歐洲人那樣“用武器來打架，而是用拳頭來毆打對方，扯對方的頭髮，然而幾句話過後，他們又成為朋友了。”一個耳光，在歐洲可能會引起一場決鬥，而在中國卻並不是甚麼特別嚴重的事情。^{（105）}奧地利人費恩伯格（Fernberger）甚至認為，中國人“喜歡哭鬧，卻很少動手打架”^{（106）}。而在日本，同樣的爭執卻常常會以死人的方式收場。武士們帶着兩柄劍——1587年後農民便被禁止帶劍了^{（107）}，當他們的榮譽受損時，便立刻拔劍相向；但很快地兩個非貴族之間的公開爭鬥就被視為是擾亂公共秩序的違法行為，違反者並不會受到肉體上的懲罰，而是被直接處以死刑。^{（108）}

與日本的情況有所區別，在對相同問題的報道中，中國人常常會被上級責打。有些作者便把這視為中國人膽小，又“有些女人氣”的原因。^{（109）}對

於一位像李明 (Le Comte) 這樣的傳教士來說，中國被一些滿族人征服的事實祇能用其自身的“自由散漫”(lâcheté)才解釋得通。⁽¹¹⁰⁾此外，與他同修會的同事弗蘭基 (Hieronymus Franchi) 1705年還報道了一件悲慘的事：康熙皇帝派遣了為數眾多的中國士兵去征討西韃靼人的一個民族，“因為這些士兵更喜好懶散和欺騙的生活，而不懂得操作槍砲和勞動，他們部分死在兩千英里長的路途中，部分因鬱悶而自殺，使得這位皇帝的進擊行動付諸東流。”(weil sie sich auf den Müßiggang und Betrug besser / dann auf das Gewehr und Arbeit verstehen / theils aus Ungemach einer so langen sich auf zwey tausend Wälsche Meil erstreckenden Reis gestorben / theils aber aus Verdruß mit dem Strang sich selbst erwürgt / mitthin des Kaysers Anschlag zu Wasser gemacht haben.)⁽¹¹¹⁾

如此缺乏國防意識顯然引起了像盧梭 (Rousseau) 這樣的城市共和國的愛國公民的反感。長城在有些作家看來，並不像今天的遊客所理解的那樣，代表技術和組織能力的最高成就，更多的祇是膽小，軟弱無能的象徵。⁽¹¹²⁾俄國駐中國公使館員，正直的約翰·喬治·溫費爾扎克特 (Johann Georg Unverzagt) 從中國人口中得知，長城是依照一位皇帝的命令所建，“他想要成為整個國家中最聰明且有學識的人／因此他把所有的學者／現在在國內的／召集起來／以便知道他們人數有多少。當他們最後都聚集到一起的時候／他便命令他們／在韃靼人入侵之前建造這樣一座牆／於是這些人不得不這樣做／並且他們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慘死在那裡”(so der klügste und gelehrteste seyn wollen im gantzen Reiche / deshalb habe er lassen alle Gelehrte / so im Reiche vorhanden waren / berufen / dadurch er wissen wolle / wie hoch dero Anzahl käme. Als sie nun zu dem Ende zusammen kamen / befahl er ihnen / solche Mauer vor dem Anfall der Tartern zu erbauen / welche dann solches thun muSten / und fast alle dabey crepierten)。⁽¹¹³⁾

手工業與藝術方面的能力

對東亞人在“機械工藝”方面能力的評判經過了一次明顯的轉折。早期的葡萄牙編年史作者卡斯特涅達 (Castanheda) 和德·戈斯 (de Góis) 認為，中華民族在手工業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天賦⁽¹¹⁴⁾；門多薩和馬菲也稱贊中國人在繪畫和技術領域能力非常出色⁽¹¹⁵⁾；法國人文學者勒華 (Le Roy) 甚至認為，中國的工藝品似乎並非出自人類之手，而是渾然天成的。然而，17世紀的一些作家對此就已經不再是那麼讚同了。⁽¹¹⁶⁾耶穌會士龐迪我就有過這樣的評論，歐洲的產品在精細程度和美觀程度上通常（當然也有例外）要遠超過中國的產品⁽¹¹⁷⁾；利馬竇／金尼閣傾向於歐洲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差別不大，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覺察到，因為中國人很節儉，所以他們製作工藝品也為了使價格更低廉而常常不能精工細作；與歐洲人比起來，中國人在建築、繪畫和雕塑方面都明顯處於下風。⁽¹¹⁸⁾對於中國音樂的評價好壞參半，對於日本音樂也是如此，一些報道者認為其毫無可取之處⁽¹¹⁹⁾；路伊士·佛羅伊士卻認為，儘管中國的上層音樂很難聽，但水手們的音樂卻不同凡響。⁽¹²⁰⁾紐霍夫也同意這一類的觀點，他甚至認為，中國人有着很高的模倣技巧，但並不是特別有創造性。⁽¹²¹⁾夏洛瓦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中國人很有創造性，卻很少把事情做得完美；日本人就不同，他們沒有甚麼創造性，卻總是把一切都做得很完美。⁽¹²²⁾但繪畫藝術是一個例外，東亞人的畫法因缺少光影和中心透視法的運用而普遍受到歐洲人的指責。⁽¹²³⁾

人們還發現，在模倣能力很強的日本人中⁽¹²⁴⁾，沒有麵包師、鞋匠、啤酒釀造師，最初也沒有鐘錶匠和玻璃吹製工這樣的職業。人們贊賞日本生產的金屬和武器——當然不是指戰艦，而更多的是指刀劍和匕首。一位書籍編撰者就曾寫道：“這些刀劍所用鋼材的品質是如此之好，以至於歐洲的鐵器與之一相碰，就會破碎。”⁽¹²⁵⁾然而，在我看來，對日本評價的轉變並不像對中國那樣令人印象深刻⁽¹²⁶⁾，這也許是因為日本製品並沒有經歷類似18世紀時的

“中國風”(Chinoiserie)那樣起初被熱情歡迎，然後又被拒絕的轉變吧？藝術上的“日本風情”(Japonismus)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的現象。⁽¹²⁷⁾在這一時期，藝術風格的多元論才取代了歐洲藝術史上所稱的“風格走馬燈”(Gänsemarsch der Stile)，人們才開始把藝術品的年齡也看作是一種價值，就像日本人數百年前就已經開始做的那樣。令早期歐洲作者們感到驚訝的還有，如同1587年的一份原始文獻中所記述的那樣，“對於他們來說/那些極新的、剛出現的東西/一文不值/……/巨大的價值則是/蘊藏在那些/經過名家之手/已然變舊了的物品”(alles bey ihnen / wann es schon nagel new vnd frisch / nicht ein Heller mehr werth / ... / der großwerth aber / ist vnd ligt allein in dem / daß es von einem vralten / ... Maister gemacht sey)，就是那些歐洲人“完全輕視並認為毫無用處的東西”(gänzlich verlachten vnd für nicht[s] hielten)。相反地，據說日本人則不看重寶石的價值。⁽¹²⁸⁾

儘管如此，日本人對於新鮮事物還是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對於陌生的事物普遍充滿好奇心，而在中國人之中，祇有平民百姓才會如此。⁽¹²⁹⁾18世紀末的時候，中國人並沒有顯示對歐洲技術有甚麼特別的興趣。當時一個龐大的英國公使團(1792/1794)曾送給中國皇帝一些複雜的光學和力學機械，但看樣子它們很快就被放進陳列室中了。⁽¹³⁰⁾在日本，情況卻正相反，葡萄牙人的登陸並非偶然地開啟了日本的“使用火砲器時代”(鐵砲器 Teppō-ki)。⁽¹³¹⁾當地的一位諸侯(大名)很快便得到了一塊火石，並讓一位鐵匠來做製，並且最終(開始可能是在葡萄牙人的幫助下)獲得了成功。之後，歐洲模式的火器便在當時還處於諸侯戰亂時代的日本迅速傳播開來。1575年的一場戰役(長篠 Nagashino)的結果，便是由這些武器決定的——這是日本統一的第一步，沒有這種革命性的武器技術，這一步恐怕不會這麼早來臨。⁽¹³²⁾

反觀歐洲，直到18世紀，遠東的一些商品，主要是茶、漆器和瓷器，還在市場上佔據壟斷地位。波特歇爾(Johann Friedrich Böttcher / Böttger)發

明的軟瓷(1709)並沒有中斷對東亞陶瓷的進口，因為陶瓷具有許多軟瓷所不具備的特性。遠東的漆器和瓷器在洛可可時期的歐洲受到極大的重視，以至於在進行生產時，東亞人就把它們按照歐洲的風格進行了調整。⁽¹³³⁾另一方面，歐洲人則不得不承認他們得益於印刷術的較早發明⁽¹³⁴⁾，在書籍的廣泛傳播⁽¹³⁵⁾和有讀寫能力的階級廣泛性方面，跟歐洲相比，東亞曾經長時間處於領先地位。

理智能力和教育水準

16-17世紀的東亞人被認為普遍具有較好的理解力並且受教育的水準很高。比如，在果阿(Goa)的耶穌會神學院，他們被認為是學科成績最好的學生。⁽¹³⁶⁾不僅如此，據說，日本的男孩子拉丁文學得也要比歐洲男孩子快。⁽¹³⁷⁾在他們本國，包括女性在內的大部分人都能夠讀和寫，上層社會的人更一定是能讀會寫。⁽¹³⁸⁾東亞的“學校體系”也令人驚訝，人們甚至提到了許多“大學”和“學院”的存在。⁽¹³⁹⁾據耶穌會士衛方濟(Noël)報道，在中國學習讀寫的青年人非常多⁽¹⁴⁰⁾；而在這之前，麥哲倫就已斷定，在中國特別是南部地區，幾乎沒有不能讀寫的人。⁽¹⁴¹⁾1838年，一位作家還把中國能夠熟練書寫的人數描寫為“驚人之多”。⁽¹⁴²⁾如果人們瞭解，還在一些年後(1850)普魯士十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還達20%，英國總人口的文盲率甚至達到30%(1861)，這種觀點便不足為奇了。⁽¹⁴³⁾

令人驚歎不已的是，東亞人可以不通過語言，而以(中文)書面文字為媒介彼此理解。⁽¹⁴⁴⁾東亞語言(及其文學創作)，特別是漢字超乎尋常的表達能力也一再被人們稱贊。⁽¹⁴⁵⁾然而，令人感到頗為矛盾的是，這種文字符號非常難於學會。路伊士·佛羅伊士就有這樣的結論：歐洲人在他們的書本中學習各種藝術和科學知識，日本人卻耗盡一生時間來掌握其文字符號的深刻意義。⁽¹⁴⁶⁾他的修會同事龐迪我也對中國教育的局限性進行了批評，中國人缺乏對任意題目進行典雅並富有道德水準的論述能力。⁽¹⁴⁷⁾晚一些的作者甚至認為，中國人能有的最

高學識也僅限於書寫層面，這在其它地方是學校裡的學生都能完成的事情。⁽¹⁴⁸⁾西班牙主教門多薩(Palafox y Mendoza)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會在對韃靼人的戰爭中失敗，就是因為中國人崇尚學識，導致那裡所有的軍事物都是由文官而非由有軍事經驗的武官掌握的緣故。⁽¹⁴⁹⁾

日本的武士毫無疑問地來源於戰爭中的士兵(後來多是擔任官職的人)，但如同許多僧侶一樣，他們對文化也極感興趣，譬如說他們也會創作詩歌，建造花園。⁽¹⁵⁰⁾18世紀時，人們常常把日本人與英國人進行比較，因為日本人也有自殺的傾向。而日本的園林建築技術卻令一位作者想到了法國而非英國的花園。當時英國花園的建造正在試圖模倣中國的“自然主義風格”。⁽¹⁵¹⁾在很久以前，利馬竇／金尼閣和紐霍夫就強調，在各種高級的藝術中，中國人祇是對倫理學有所瞭解，對自然科學幾乎一無所知，對醫學也知之甚少。⁽¹⁵²⁾與他們同時代的著名地理學家貝納爾德·瓦倫(Bernhard Varen)也認為，日本人在科學和藝術領域要勝過印度人，與中國人能力相當，但在所有科學領域都比歐洲人要差。瓦倫寫道，“他們沒有今天意義上的通過法規和書本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法學”，他們雖然瞭解一些植物和混合藥劑的療效，但在外科學方面卻毫無經驗，並且與中國人一樣，對醫學、物理學和天文學所知甚少，對算術學也祇有很少的理解。⁽¹⁵³⁾

無可非議，東亞人學識的最高成就並不在自然科學與技術方面。東亞人這方面的知識開始時還受到歐洲人的尊重⁽¹⁵⁴⁾，之後便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不完善和充滿錯誤的，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這些知識純粹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之上，並沒有形成一套方法體系。此外，東亞國家也很少推動這方面的發展。⁽¹⁵⁵⁾日本人非常缺乏世界觀方面的知識，在他們眼中，世界(似乎祇)包括日本、中國和暹羅三部分。⁽¹⁵⁶⁾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更令歐洲人感到吃驚和困惑：中國位於世界的正中央，周邊是所謂的“四夷”王國，再遠一點是一系列的小島，其中的一兩個，耶穌會士麥哲倫在他1668年的著作中氣憤地寫道，近來被

稱作“歐洲”。⁽¹⁵⁷⁾由於對中國地圖——與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地圖差不多——形而上的意義缺乏理解，這些報道者們總是對所謂的中國人天生的狂妄自大及其地理知識的匱乏感到惱怒。⁽¹⁵⁸⁾

中國人有兩隻眼睛，歐洲人有一隻，其他的民族都是瞎子。——這句中國諺語在如此多的作者中廣泛流傳，甚至當時在歐洲範圍內著名的自然和人類法學家塞繆夫·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也知道它。⁽¹⁵⁹⁾考慮到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以及包括印刷術在內的眾多發明，在早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¹⁶⁰⁾，人們有時候也能對這種觀點表示理解。但是中國古代文明究竟有多麼古老這一問題，人們一直在激烈地爭論着。⁽¹⁶¹⁾在有進步意識的英國，人們便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中國：“它灰白色的年齡祇不過是老態龍鍾的表現罷了。(Its hoary age is but senility.)”⁽¹⁶²⁾

18世紀著名的天文學家費雷烈(Frérét)認為，中國的科學知識還停留在古代的水準上。⁽¹⁶³⁾對中國相當友好的作家阿貝·德·馬爾西(Abbé de Marsy)也承認，歐洲三百年內在科學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中國卻用了近四千年的時間。⁽¹⁶⁴⁾這樣一種觀點的驟然改變當然會引起一定的後果，就連像伏爾泰這樣的根深蒂固的親中國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人的科學、藝術及技術能力的評價也越來越低，奧地利的《真實的國家、報紙及會話辭典》(Reales Staats-, Zeitungs- und Conversationslexicon)的不同版本也體現出了這一趨勢。⁽¹⁶⁵⁾對於中國的評價都是以耶穌會士的報道為依據的，而他們從不否認，中國人在科學技術領域有獨立取得成就的天賦。聖沙勿略稱贊中國人理解力深刻，麥哲倫也寫道，中國人可以輕易地理解最難於琢磨的數學、哲學和神學問題。⁽¹⁶⁶⁾祇不過傳教士們強調，中國人祇是在“政治道德學”(scientia politico-moralis)方面受到完全的教育⁽¹⁶⁷⁾，著名的哲學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在他關於中國人的道德哲學的演講中指出，在中國道德哲學祇是從經驗中所獲得的，並未形成一套學科體系。⁽¹⁶⁸⁾

政治制度

中國的政治制度令歐洲人深感震驚，在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竟沒有社會等級之分。書籍編撰者門多薩指出，在中國沒有侯爵、公爵、邊疆伯爵、伯爵以及家臣這些階層，甚至在滿族人統治之前，中國都沒有世襲的貴族。⁽¹⁶⁹⁾利馬竇／金尼閣認為，中國的皇帝本人為哲學家所統治⁽¹⁷⁰⁾——文官在中國的地位便是一個例證。18世紀的歐洲哲學家沃爾夫和伏爾泰還認為中國的這種制度是值得歐洲學習的榜樣。⁽¹⁷¹⁾當時的歐洲人對於這樣的一種官僚制度顯然還不太瞭解。

然而從一開始，歐洲人就感到對日本的社會制度非常熟悉。耶穌會士維列拉（Vilela）在1557年就提到日本有三個（之後是四個）“等級”：貴族、僧人和日常勞動者——之後又分為手工業者和農民。范禮安把兵士算作“第三”等級⁽¹⁷²⁾，也就是低級貴族，也歸入到等級制度中。書籍編撰者利巴德內拉（San Roman de Ribadeneyra）列舉出了以下五個等級：1）在國家範圍內（德國 Alemania）不同程度上自由的，也就是獨立的統治者，他們根據需要把自己的大片地產作為采邑分封給有戰鬥能力的武士們，他們擁有的更多的是權力而非財富；2）神職人員；3）小貴族（Hidalgos），這裡指的當然是武士階層；4）手工業者等；5）農民以及其他⁽¹⁷³⁾，——商會會長卡朗（Caron）認為這些人“類似於農奴”，靠主人給他們的部分收成過活。⁽¹⁷⁴⁾路伊士·佛羅伊士發現，在日本還存在着賤民這一等級。⁽¹⁷⁵⁾馬菲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人和歐洲人祇是在生活方式上有所差異，二者的社會制度則是相同的。⁽¹⁷⁶⁾

許多作者還對世俗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等級制度進行了區分。一開始歐洲人就知道，在日本有兩位皇帝，一位是在精神上非常受人崇拜的首領（天皇），祇有間接的權力；另一位是政治軍事上的首領，將軍。人們有時把前者與教皇相提並論，因為他也會任命“主教”（與修道院院長相似）；後者則與布拉格或維也納的皇帝類似，地位排在其後的是起

初獨立、但從1600年“帝國統一”之後便變得恭順的“國王”，再之後是諸侯和地位更低的統治者。⁽¹⁷⁷⁾在中國，則是所有的權力和威嚴都由皇帝一人掌控，包括溝通人世與上天這一使命在內。⁽¹⁷⁸⁾

日本的貴族是土地的絕對的支配者，等級制中的每一級都對其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以至於他們可以不作任何解釋，就奪去下級的生命。相應地，一家之主對他的家庭成員也擁有同樣的權力。⁽¹⁷⁹⁾英國人理查·考克斯（Richard Cocks）認為，這是最糟糕的專制統治。⁽¹⁸⁰⁾在日本——特別情況下也在中國——罪犯的家屬，至少是男性家屬，及其信任的人也要和罪犯一樣被處以極刑。⁽¹⁸¹⁾歐洲人對於這種做法很是不解，因為羅馬法律一向是以個人責任原則為指導的。

在日本，至少在16世紀的時候，顯然還沒有真正的法官⁽¹⁸²⁾，而在中國，司法人員卻一直是令人敬畏的。一個對官員不夠尊重的僕從與一個進行欺騙行為的人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一定數量的杖責。⁽¹⁸³⁾從理論上講，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中國的國家制度是符合理性原則的⁽¹⁸⁴⁾，刑事訴訟也在官僚體系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法官們在訴訟前不准喝酒，這在西班牙人門多薩的眼中無疑是一項嚴厲的要求。⁽¹⁸⁵⁾在整個帝國範圍內，中國人以同樣的司法形式來管理，並且判決很快就會得到執行，這竟促使一個英國的譯者寫下了如下的按語：“中國人的判決和法律執行是最直接的。（*The Chinos most vpright in all their iugdmnts and in execution of iustice*），儘管門多薩對此進行報道時寫道，中國的刑吏在執行體罰時猶如“惡魔般殘虐”。⁽¹⁸⁶⁾

根據描述，在中國和日本，通姦這種違法行為是極少發生的。無論在甚麼情況下，丈夫——在日本，丈夫不在的時候親屬或僕人——都擁有殺死現場發現的通姦者的權力。若是事後才發現，就要由司法者或統治者來裁定。一旦他們被證明有罪，在日本他們面臨的處決將是異常嚴酷的（這裡不再贅述）。在中國，對於這種情況，當事者祇會被處以嚴重的體罰，之後丈夫則可以把妻子當作女奴賣掉。⁽¹⁸⁷⁾從理論上來講，中國人對死刑的執行特別

設置了種種巨大障礙，通常死刑都要通過皇帝本人的核准才允許執行，這對歐洲人來說，是極其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但同時這也是對官僚機構能力的一種浪費。⁽¹⁸⁸⁾然而，事實上肯定存在這種情況，就是違法者因無法承受體罰而死去。⁽¹⁸⁹⁾日本的法律狀態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各種報道顯示，在日本，人的生命根本算不上甚麼，比如即使是最小的偷竊行為，違法者都會被處以死刑。⁽¹⁹⁰⁾孟德斯鳩（Montesquieu）從肯普費（Kaempfer）書中所讀到的如是情景，促使他作出了如下的思考：太過嚴厲的刑法必然是無效的。在日本當局嚴酷的刑罰下，不祇是羞恥心在戰慄，連自然本性也動搖了。⁽¹⁹¹⁾

在歐洲人眼中，日本人對自己也是不近人情的殘酷。⁽¹⁹²⁾天主教的傳教士在報道中對 1597 年以降在日本的基督徒所遭受的殘酷迫害進行了圖文並茂的描述，為的是讓自己歐洲家鄉的讀者能夠被那裡的日本和歐洲殉道者（其中還包括兒童）難以置信的堅定所鼓舞。幾乎每個英國或荷蘭商人在報道中都會詳細地剖割腹自殺（Harakiri 或 *seppuku*）的行為進行描述。據報道，日本青年在感覺受到了父母或其他人的不公正對待時，就會儀式性地剖割腹自殺。這也可能是忠誠的一種表現。康德（Kant）認為，一個主人的僕人們有時也會為了這一榮譽而互相爭吵；但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上層社會保有的一項懲罰措施，下屬們迫於主人的命令才會這樣做。⁽¹⁹³⁾英國人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1611 年對日本司法的評價是，非常嚴厲，卻很公正；他甚至認為世界上沒有其它國家能像日本統治得那樣好。相反地，他的同胞約翰·薩利斯（John Saris）卻認為，日本人處死違法者的方法非常殘忍，每一個路過的人都可以在他們的身體上試驗自己劍的鋒利程度，直到他們的身體被刺成小塊為止。⁽¹⁹⁴⁾此外，在日本還有其它死刑方式，譬如把人釘在十字架上處死。⁽¹⁹⁵⁾在歐洲大陸，人們對死刑，特別是執行時給人帶來長久折磨的死刑批判得越來越多，相應地，歐洲人就越發覺得日本的死刑太殘忍。

在日本的大城市，由於嚴厲的刑罰和嚴密的安全防範措施，像入室盜竊和搶劫這樣的違法行

為非常少見。⁽¹⁹⁶⁾而在一座中國的城市中，人們是很難睡得平靜的。耶穌會傳教士李明報道，中國的小偷非常狡詐，能從任何地方進入室內，並且會製造一種能令人昏睡的煙，一個人早晨醒來就發現包括床簾在內的所有物品都被洗劫一空的情況是完全可能發生的。⁽¹⁹⁷⁾與之相反，據歐維士報道，日本的房子既沒有鎖又沒有門門⁽¹⁹⁸⁾。儘管內戰後發生了重大的社會變革，日本在報道者眼中仍是一個有許多乞丐的貧窮國家；另一方面，日本統治階級卻收入巨額的黃金，用來供養強大的軍隊：據卡朗描述 1636 年將軍擁有的軍隊人數為十二萬人，他的下屬還擁有着大約四十萬人的隊伍，而在當時絕對沒有任何一位歐洲的統治者能徵募到如此多的兵力。⁽¹⁹⁹⁾

在歐洲人看來，中國在達到了繁榮的頂點之後就開始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了。起初中國似乎是一個物產過剩的國家，在那裡，被啟蒙運動前的歐洲政治作家視為經濟停滯主要原因的游手好閒的行為被成功地克服。一些作者判定，明朝時的中國既沒有乞丐又沒有流浪漢，這對當時的歐洲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²⁰⁰⁾在 1637 年，在明末這個無可挽回的衰落時代，一位英國的遊客還曾寫道：據說這個國家古蹟甚多、領土廣大、人們富饒並且物產豐富。考慮到所有的情況，我想，在政府的手段方法上沒有哪個國家可與其相比。（This Countrie May be said to excell in these particulars: Antiquity, Largeness, Richeness, Plentifullnesse. For Arts and manner off government I think noe Kingdome in the world Comparable to it. Considered altogether.）⁽²⁰¹⁾

然而，他的英國同胞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大約一百四十年後卻對中國作了不同的描述：中國下層階級遠比歐洲最貧困的民族還要貧窮。（The poverty of the lower ranks of people in China far surpasses that of the most beggarly nations in Europa.）⁽²⁰²⁾事實上，由於這一時期人口急速增加，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已明顯地下降了。⁽²⁰³⁾斯密在他的評論中首先關注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而較少關注因在中國官方地位更高而令重農主義者感到

非常驚奇的農民階層。⁽²⁰⁴⁾ 斯密卻從不否認中國人很勤奮。而他的同時代人、對中國頗感恐懼的元帥安森 (Anson) 爵士及其同事里查德·沃爾特 (Richard Walter) 則認為，儘管中國人有些懶散，但仍是很好的工人。⁽²⁰⁵⁾ 這一來自英國的旅行報告在此期間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中國在歐洲啟蒙時期的形象變得灰暗。而在這之前，由於伏爾泰的出色工作，這一形象曾經是那樣的光芒四射。⁽²⁰⁶⁾ 對於日本，儘管之前俄國海軍官戈洛夫寧 (Golovnin) 在談到“民眾啟蒙”問題時，還曾稱日本人是“太陽底下最開明的民族”，儘管在他和瑞士人圖恩伯格 (Thunberg)⁽²⁰⁷⁾ 理想化的遊記中，日本還被作為批判歐洲時可相對比的榜樣而贏得了積極正面的印象，但這一時期的日本仍免不了與中國具有相同的境況。兩國的孤立政策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特別是在歐洲人的優越感越來越強的時候。⁽²⁰⁸⁾ 肯普費旅行報道的出版人多姆 (Christian Wilhelm v. Dohm) 對東亞人的成就有過相當正面的評價，但他卻在 1779 年寫道：“幾乎每種藝術都是由東亞人發明的，而幾乎每一種又都被歐洲人所超越了。”他們的科學名不副實，因為“那裡幾乎所有的領域都處於專制統治下”，他們根本不能夠發展自己的科學。⁽²⁰⁹⁾

另一方面，日本人自以為——主要是在武器和勇氣方面無可比擬，他們對於陌生人的友好也祇限於剛剛接觸對方時罷了。⁽²¹⁰⁾ 首批來到日本的英國人從大阪報道，當地的人往他們身上扔石頭，並喊他們是“中國人”和“朝鮮人”⁽²¹¹⁾——當然這種情況今天是不會再見到了。類似的事情其他的歐洲人也經歷過。恩格爾伯特·肯普費認為，這祇是“任何地方都會有的街市流氓的惡劣”行徑而已。這個把大阪的米酒視作日本最好米酒的人甚至認為，日本人“願意這樣拉着我們這些陌生人的手，如果這對他們來說是被允許的話。(uns als Fremdlinge auf den Händen tragen ..., wenn es ihnen erlaubt wäre.)”⁽²¹²⁾ 直到 1750 年左右，歐洲人祇是把東亞國家的閉關鎖國政策當作一種不信任的誇張表現形式。歐洲人儘管有時也會批評這一政策，但主要地他們對此還是

表示理解，比如肯普費和沃爾夫便是如此。⁽²¹³⁾ 時任王室財政官員的尤斯蒂 (Justi) 也認為，有兩條路可以達到“一個民族最大的幸福和力量”，一條是國際化、特別是商貿關係之路——英國當時無疑在這條路上走在最前列；另一條則是與“其他民族相隔離”的“哲學”之路，在提及這一點時，尤斯蒂所想到的最可能的就是遠東民族了。⁽²¹⁴⁾ 到 19 世紀時，歐美國文化圈中的人們便不再這麼認為了。鴉片戰爭和日本的被迫開放便是這一觀念轉變的結果。⁽²¹⁵⁾

結 論

《論印度的法律》(*De Indiarum jure*, 1629) 這部著作是有關西班牙殖民法爭論的最高潮和終結點。在這部著作中，國王法學家索洛薩諾·佩雷拉 (Solórzano Pereira) 以及之前已有很大影響的耶穌會大主教阿科斯塔 (José de Acosta)，把野蠻人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已經相當文明化的民族，從國際法角度講與歐洲人地位相當。這裡他指的便是中國人和日本人。⁽²¹⁶⁾ 這種同等性在今天早已不成問題，但在歐洲的啟蒙時期 (孟德斯鳩、狄德羅 (Diderot) 和盧梭所處的時代) 以及帝國主義時期，這一看法卻備受質疑。我認為，這與當時歐洲越來越普遍地把異國人視為“他者”有關，啟蒙時期“世界主義” (Kosmopolitismus) 的核心無非就是“歐洲主義” (Europäismus)。當中國因其古老的文化“很少把外國看成是自我世界的鏡子或參照者”，而是把它們排除在外或統一於自身之中時⁽²¹⁷⁾，歐洲或許正需要這樣的參照者來確定自己的新身份。極端地說，“歐洲” (Europa) 從 18 世紀才開始由原始的地理概念轉變為文化概念。但作為“歐洲人”的感覺很快就與歸屬於某一特定“民族”的認知疊加了起來。⁽²¹⁸⁾

這種民族意識東亞人早已有之：其中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緊張——人們甚至用愛恨交織 (Haßliebe) 來形容這種由拒絕到疏遠的關係。⁽²¹⁹⁾ 毫無疑問，歐洲的中國觀和日本觀就呈現在數目眾多的鉛版印刷作品中。在日本這些觀點則被保存在那些木板印刷的作品中，並且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

存到今天，就像小林義彥(Yoshihiko Kobayashi)在關於日本的報道中所發現的那樣。由於資訊的缺乏，這些報道中的許多內容都是相同的。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za)察覺到，1700年以後對中國的報道品質下降了，這是當時的啟蒙主義者把這些報道當作工具，從而以自己的意願為出發點來確定其內容的必然結果。⁽²²⁰⁾那時中國形象的確定模式是：古老的高度文明——具體如造紙術、指南針、火藥的發明，以及一種對中國人的朦朧認識——由於孔子和古代皇帝的教化，中國人普遍具有友好寬容的才智。中國人似乎是一個螞蟻般勤奮卻又蜜蜂般擁擠的民族，同樣令“普通”人不解的還有他們的語言文字，以及同樣令人難以看透的他們那長着一對細長眼睛的臉上面具般的微笑。歐洲人認為，中國人常常帶些狡猾地賣力工作，主要是為了在這樣一個雖然面積廣大、土地肥沃卻仍舊擁擠不堪的國家中保障對生活的供給。數千年來，中國人忙於生計，躲在長城後面過着相當和平卻也十分孤立的生活。結果是，他們早期較高的科學水準和政治制度在進入本世紀的時候“被排除在世界運動之外了”⁽²²¹⁾，蘭克(Leopold v. Ranke)如是說道。另根據克賴納(Josef Kreiner)的觀察結果，從18世紀中期開始，歐洲的日本觀便有與其中國觀類同的趨勢。⁽²²²⁾在這樣的先決條件下，歐洲人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東亞兩種陌生文化而進行的比較的努力還會有甚麼用途呢？

我認為，首先人們不僅以這種方式獲得了對歐洲的認識，也獲得了對東亞歷史的認識。把歐洲、日本以及中國三者相比較，可以看出日本在15到17世紀時的刑罰無論是以歐洲的標準還是以中國的標準來看都顯得過於嚴厲了。⁽²²³⁾這與日本人已漸形成的國民性並沒有甚麼關聯，倒是如喬治·桑松(George B. Sansom)所說，是“戰爭法的產物”。⁽²²⁴⁾但是，這種看法對歐洲的日本觀一直有着影響——如孟德斯鳩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樣——當日本的刑罰已經明顯的不再那麼嚴厲時還是如此，這部分是因為歐洲人沒有注意到日本內部的這種變化⁽²²⁵⁾，部分則是因為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已經比東亞更

快地放棄了體罰和死刑的使用。因此在我看來，除了對已經明瞭的相對概念“野蠻人”與“文明人”進行研究之外，對世界各高等文明之不同發展過程進行追蹤也是非常重要的。

倘反觀之，歐洲作者們對東亞人勤奮、清潔、有禮貌等特點所表現出的熱忱，也不禁令我對自己的祖先是否也具備這些品質表示懷疑。⁽²²⁶⁾如果一種“反向操作”(Gegenrechnung)能夠成功從而知曉“另一方”(andere Seite)是如何看待歐洲人的話，這種疑問便能澄清了。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在出島(Deshima)的荷蘭商人是很有特權的，他們甚至受到與大名同等的待遇。肯普費關於荷蘭人在日本的報道至今還清晰地留在歐洲人的記憶中，將軍在接見他們時邀他們(商館長除外)表演“真正的滑稽劇”、按照“歐洲”風格舞蹈、跳躍、唱歌、像醉酒般跌跌撞撞地行走等等，這令他們覺得很是屈辱。在類似的對比中人們還指出，至少在16世紀的時候，歐洲人普遍的飲食方式還是用手來抓取食物，這在東亞人看來，從最好的方面來講可以說是滑稽有趣，但從根本上來講是極其令人嫌惡的。⁽²²⁷⁾日本人認為外國人是“熱情的”，確切地說，是輕率的、粗魯的、不受控制並且野蠻的，因為他們都習慣於大聲地交談。⁽²²⁸⁾令日本人更加困擾的是，在面對最糟糕的災禍時，歐洲人並不會遏制住自己強烈的憤怒，“淡泊”平靜地對其予以接受。日本人則與之相反，根據一位耶穌會士的報道，在日本人之間“從不會……/如在我們中普遍存在的那樣/發生爭執/聽到粗魯的言語和喊叫聲(niemals ... / wie bey vns gar gebreuchlich / Vnfridt / Böldern vnnd Geschrey Hört)。”⁽²²⁹⁾但就算在日常生活之外，通過雙方彼此互映的證實還是能或多或少得出確定的、“客觀的”結論來的。歐洲人的思維是抽象分析的，東亞人的思維卻是綜合的、與具體情境相結合的。這種思維模式的不同並不是今天的學者們⁽²³⁰⁾才發現的，譬如早在16世紀的時候，耶穌會傳教士路伊士·佛羅伊士就發現了歐洲人與日本人這方面的差別。他的描述並不局限在諸如日本人與歐洲人用不同的手指挖鼻孔這種問題上——這在今天也還

會被提及，他業已覺察到：“在歐洲，人們追求詞語的明確性，盡量避免歧義；在日本，多義的表達被看作是最好的語言，並且最受到重視。”⁽²³¹⁾ 我認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樣的模式來思考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我們能夠認清差別所在，並盡量避免彼此間的誤解。

【註】

- (1) 請參考：Bitterli, Urs, *Die Entdeckung des schwarzen Afrikaners. Versuch einer Geistes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afrikanischen Beziehungen an der Guineaküst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 v. Albertini, Rudolf u. Gollwitzer, Heinz (Hgg.), *Beiträge zur Kolonial- und Überseegeschichte*, Bd. 5, Zürich u. Freiburg/Br. 1970 [第2版1980]；Martin, Peter, *Schwarze Teufel, edle Mohren*, Hamburg 1993, 例如 S. 9, 12f., 81ff. Sadj, Uta, *Der Mohr auf der deutschen Bühne des 18. Jahrhunderts*, = *Wort und Musik. Salzburger Akademische Beiträge*, Bd. 11, Anif/Salzburg 1992, S. 1, 其中指出，除了黑人之外，在18世紀時，北非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甚至印度人都歸為“Mohren”。
- (2) Lach, Donald Frederik bzw. Ders. u. Van Kley, Edwin,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3 Bde. in 10 Teilen, Chicago u. London 1965/93, 此處 Bd. I/2, S. 625f.: 這本書中的兩種形式 (Zipangu 和 Zipangri) 都來自 Jih-pên kuo (日本國) 一詞，意為“日出之國”。拉赫 (Lach) 這部關於歐洲人在亞洲國家遊記的著作內容極其豐富，書中很少用大段的文字來進行分析，而是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對原始資料的總結評注上。下列為極有價值的關於日本的原始資料集，其內容可謂是無所不包：Kapitza, Peter (Hg.), *Japan in Europa. Texte und Bilddokumente zur europäischen Japankenntnis von Marco Polo bis Wilhelm von Humboldt*, 2 Bde. u. Registerband, München 1990。在本篇文章中我所用的資料主要限於關於日本觀的大量卷宗，可用的關於中國觀的內容翔實的出版物不多，因此我祇能查閱原典。關於近代早期日本歷史的兩部較新的內容翔實的概說性著述是：Hall, John Whitney (H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Bd. 4: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u. a. 1991, 以及 Totman, Conrad, *Early Modern Japan*, Berkeley u. a. 1993。
- (3) 關於中世紀時的東亞觀：Reichert, Folker E., “Zipangu - Japans Entdeckung im Mittelalter”, in: Croissant, Doris u. Ledderose, Lothar (Hgg.), *Japan und Europa 1543-1929*, (展覽目錄，畫冊) Berlin 1993, S. 25-36 (以及以下部分)。
- (4) 請參考：Wood, Frances, *Marco Polo kam nicht bis China*, dt. München u. Zürich 1996 (engl.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
- (5) Polo, Marco, *Von Venedig nach China 1271-1292*, hg. v. Knust, Theodor A., Stuttgart 1983, S. 256ff. (Buch 3, Kap. 2 u. 3); Demareest, Geert (Hg.), *Die Reisen des Marco Polo. Nach seinen Aufzeichnungen aus dem 14. Jahrhundert*, Bergisch Gladbach 1983, S.185ff.; Reichert, Folker, *Columbus und Marco Polo - Asien in Amerika. Zur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Entdeckungen*, in: *Zeitschrift f_r Historische Forschung* 15, 1988, S. 1-63, 特別是 S. 4, 26, 29f., 36ff., 45, 48f., 56ff.; 同一作者, Zipangu (見註3), S. 28ff.; Kreiner, Josef, *Das Bild Japans in der europä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in: *Japanstudien* 1, 1989, S. 13-42, 此處 S. 14f. Johann Ruysch 從一張1508年的地圖上猜測海地 (Spagnola bzw. Española) 與日本的關係，因為除了偶像崇拜之外，馬可·波羅對於 Zipangu 的描述都符合這個小島上的情況。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54f., 文中指出，岡薩雷斯·德·門多薩 (González de Mendoza 1585) 推測，在日本附近有一個女族國，在一張當時在意大利的日本地圖上也標有一個殺戮男子的女人島——那裡生活著《法華經》中記載的女惡魔。中世紀思想對異文化認知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例見 Daniel, Norman,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 Edinburgh 1960, S. 271ff.
- (6) 1514 和 1543 這兩個年份並不十分確定。例如還可參看 Vos, Ken, Dejima, “fenêtre sur le monde et ouverture sur l'étranger”, in: *Oranda, Les Pays-Bas au Japon 1600-1868*, (展覽目錄) Brüssel 1989, S. 13-27, 此處 S. 15, 以前通常認為葡萄牙人到達日本的時間是1542年。也請參考：Villiers, John, “The Portuguese and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Milword, Peter (Hg.), *Portuguese Voyages to Asia and Japan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Tokyo 1994, S. 3-13, 此處 S. 3f.;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61, 給出了諸多有關文獻。Elisonas, Jurgis, “Christianity and the daimyo”, in: J. W. Hall, *History* (見註2), S. 301-372, 頁302中提到大約在1543年有兩到三個葡萄牙人在種子島登陸。
- (7)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411f.
- (8) Demel, Walter, *Antike Quellen und die Theorien des 16. Jahrhunderts zur Frage der Abstammung der Chinesen. Überlegungen zu einem frühneuzeitlichen Diskussionsthema*, in: *Saeculum* 37, 1986, S. 199-211, 此處 S. 205ff.
- (9) 文獻中通常記載的是，葡萄牙“商人”乘一艘因風暴而偏離航線的中國帆船漂流到種子島上。Vos, Frits, “Le chef coq, le hors d'œuvre et un., demi-dimanche entier: emprunts au néerlandais et au français dans la langue japonnaise”, in: *Oranda* (見註6), S. 51-69, 其中59頁提到“三個叛亂的葡萄牙海盜” (trois pirates mutinés portugais)。通常可以說，16世紀時去往東亞的許多歐洲

- 人都兼有“商人—冒險者”雙重身份，在英語和葡萄牙語中都用這個詞語來委婉的表達這一概念。
- (10) 關於這一題目和相關論述參看 Schurhammer, Georg, *Die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 zur Zeit des Hl. Franz Xaver (1538-1552)*, = ders., *Gesammelte Studien*, Bd. 1, (Neudruck) Rom 1962, Nr. 4283-4288; ders., *Franz Xaver.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Bd. II/3, Freiburg 1973, 以及博克塞 (Boxer, Charles Ralph) 的多部著作，特別是 ders.,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1951, 重印 1974. 請參考：例如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09, 112.
- (11) Demel, Walter, *Als Fremde in China. Das Reich der Mitte im Spiegel frühneuzeitlicher europäischer Reiseberichte*, München 1992, S. 47ff.;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730ff.
- (12) 請參考：例如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73ff; “Informatione dell'isola novamente scoperta nelle parte settentrione chiamate Giapan”, in: Ramusio, Gian Battista (Hg.), *Navigazioni et Viaggi. Venice 1563-1606*, 3 Bde., = *Mundus Novus*, 1. ser. Bde., II-IV, Amsterdam 1967/70, 此處 Bd. I, S. 377vff.;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74ff. Sousa, Francisco de, *Oriente conquistado a Jesus Christo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província de Goa* [2 Bde., Lisboa 1710], hg. v. Lopes de Almeida, Manuel, Porto 1978, 這部著作對中日兩國直到 1585 年前的情況進行了描述，其中對日本的敘述要遠多於中國。儘管沙勿略在書信中表現出的是一幅美化了的圖景，他在 1549 年時還是提醒他的同事，要虔誠地進行報道。Cooper, Michael, “The Early Jesuits in Japan and Buddhism”, in: Milward, Peter (Hg.), *Portuguese Voyages to Asia and Japan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Tokyo 1994, S. 43-57, 此處 S.43.
- (13) *Franz Xaver an das Jesuitenkolleg in Coimbra*, Kangoshima, 5.10.1549, 引文所依據 G.B. Ramusio (Hg.), *Navigazioni* (見註 12), I, S. 381: “……在我們與他們進行的對話中，可見他們是善良的民族，並且在非基督徒民族中他們是善良的、美好的、並且不懷惡意的民族……” (“... la gente con la qual habbiamo conuersato è la migliore che insino adesso si sia scoperta: & fra infideli pare che non si trouerà vn'altra migliore. generalmente sono di buon cōuersatione. son buoni & non malitiosi, & stiamo mirabilmente l'honore piu che niuna altra cosa. cōmunemente sono poueri ...”)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2, 74, 92 (引自 1552 年 1 月 29 日書信)。根據 Pinto, Fernão Mendes, *Peregrinação e outras obras*, hg. v. Saraiva, António, 4 Bde., Lisboa 1961/84, 此處 Bd. II, S. 246f., 耶穌會士沙勿略說，他並不懷疑古典作家們所作的報道，中國人比羅馬人和其他所有民族都要好。
- (14) 請參考：Moran, Joseph F., *The Japanese and the Jesuits. Alessandro Valignano in sixteenth-century Japan*, London u. a. 1993, 特別是 S. 50ff., 97ff., 165f., 其中范禮安對於日本人的接受能力已不像他早先那樣大加贊揚，但他仍堅持，日本人與異教徒羅馬人相比是“充滿理性且高尚的”。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71f.; Maffei <us>, Jo [hannes] Petrus [Giovanni Pietro], *Historiarvm Indicarvm libri XVI, selectarvm item ex India Epistolarum eodem interprete Libri IIII*, Venetiis 1589, S. 208v: “在整個世界中，這個民族是敏銳的，有智慧的，並且本性善良。他們在判斷能力和記憶力方面要優於東西方諸民族” (“In vniuersum, acuta, sagax, ac bene à natura informata gens est: iudicio, docilitate memoria, non Eois modo, sed etiam Hesperijs nationibus antecellit.”) 引文參見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85, 707, 其他從多角度對此進行批判的例子參看 J. Kreiner, *Bild* (見註 5), S. 16ff.
- (15)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1, S. 290ff.; Sansom, Georg B.; *Japan. Von der Frühgeschichte bis zum Ende des Feudalsystems*, dt. Essen 1975, S. 405ff., 此書作者對伊比利亞人特別是對耶穌會士的評價在我看來是過於消極了。
- (16) Yamashiro, José, *Choque Luso no Japão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São Paulo 1989, S. 81. K. Matsuda 認為，當時受洗禮的人總數達到了八十到一百萬。到 1582 年時，一批耶穌會士洗禮的人數達十五萬之多。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89. Reischauer, Edwin O., *The Japaeese*, (Tuttle edition), Tokyo 第 13 版 1979, S. 64, 其中記載日本在 17 世紀時有近五十萬基督徒——當時基督徒在日本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要遠遠超過今天。
- (17) González de Mendoza, Joan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1585], hg. v. Garcia, Felix, = *España misionera*, Bd. 2, Madrid 1944. 上述數位以四個圖書館影印的圖書目錄為依據，分別是：1) *Britisch Library Catalogue*, 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uteurs*, 3)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Alter Katalog*, 4) *National Union Catalogue*. 此外，圖書目錄方面的資料由 Cordier, Henri (ders.,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5 Bde., 第 2 版 Paris 1904-1924, ND 3 Bde. Hildesheim 1971), Pfister, Louis (der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2 Bde., =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Bde. 59, 60, Chang-Hai 1932/34) 和 Streit, Robert (ders. bzw. ders. u. Dindinger, Johannes, *Bibliotheca missionum*, Bde. 4, 5, 7, Freiburg i. Br. 1928/31) 提供。
- (18) 請參考：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88ff., 特別是 S.701f., 書中有所保留地指出，關於“公使團之旅”的五十五部各種各樣的出版物，在將他們在羅馬受到接見的報道由拉丁文轉寫、翻譯時進行了美化。另一方面，書中還強調，這些著作在遠離羅馬的烈日 (Lüttich) 和克拉科夫

(Krakau)出版，並且令新教徒們感到有必要對耶穌會士這樣公開宣傳的成功作出回應。關於公使團可參看 J. Yamashiro, *Choque* (見註 16), S. 60ff., Silva, Maria Manuela u. Marinho Álvarez, José, *Ensaio lusonipônicos*, Lisboa 1986, S. 28ff., 他們在 25 頁以有些難解的方式稱公使團為“日本的儀式”(“acto japonês”), 並在 28 頁中稱范禮安是他們的唯一組織者。

- (19) Cooper, Michael, *Japan described*, in: ders. (Hg.),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The First Europeans in Japan*. Tokyo u. Palo Alto 1971, S. 100.
- (20) 對日荷關係較新的描述可參看 Goodman, Grant K., *Japan: The Dutch Experience*, London u. Dover / N. H., 1986 (書中第 20 頁提到，在出島〔Deshima〕上的荷蘭人很少會超過二十個！)，關於日本和伊比利亞的關係請參考有傾向性的科普讀物 Cabezas, Antonio, *El siglo ibérico del Japón. La presencia hispano-portuguesa en Japón (1543-1643)*, Valladolid 1994; Loureiro, Rui, *Os Portugueses e o Japão no século XVI*, Lisboa 1990; J. Yamashiro, Choque; Carneiro, Roberto u. Teodoro de Matos, Artur (Hgg.), *O século cristão do Japão*, Lisboa 1994, 以及收入多篇文章的論文集 Boxer, Charles Ralph, *Portuguese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in Feudal Japan, 1543-1640*, London 1986. 孟德衛 (David E. Mungello) 認為，1700 年以後，由於啟蒙思想家將中國知識政治工具化和表面化的利用，中國知識也開始“退化”，這又引起了一系列排斥中國的反應 (同一作者，*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Md. u. a. 1999, S. 84, 90)。
- (21) Montanus, Arnoldus, *Denckwürdige Gesandtschaften der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 in den Vereinigten Niederländern / an unterschiedliche Keyser von Japan*, Amsterdam 1670, J. Meurs 的前言 (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90)。荷蘭語版在一年前出版。
- (22) 例如在“殉教使節”方面：Videira Pires, Benjamin, *Embaixada Mártir*, Macau 1965. 此外請參考：Sica, Maria, *Alle origini della conoscenza del Giappone in Italia*, in: dies. u. Verde, Antonio (Hgg.), *Breve storia dei rapporti culturali italo-giapponesi e dell'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di Tokyo*, Ravenna 1999, S. 23-31. 夏洛瓦 (Charlevoix) 在 1736 年的有關日本的著作中對於日本人葬禮的描寫，是以 1597 年去世的路伊士·佛羅伊士 (Luís Fróis) 的記載為依據的。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21.
- (23)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45: “他們在管理自己的國家時是如此的明智，在工藝方面也很有才智”。 (“tan prudentes en el gobierno de su República, y de ingenios tan sutiles en todas las artes”.)
- (24) 關於中國人，參看曾擔任過耶穌會中國教區總長的龍華民 (Longobardi 或 Longobardo) 的論述，詳見 W. Demel, *Fremde* (見註 11), S. 188ff., 托雷斯 (Cosme de Torres) 對日本人的評論引自 Cooper, Michael, *They Came to Japan. 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Reports, 1543-1640*, London 1965, S. 40, 沙勿略 1549 年 1 月 21 日至 6 月 22 日及 1552 年 1 月 29 日的書信引自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76ff., 91.
- (25) 引文據 Jorissen, Engelbert, *Das Japanbild im “Traktat” (1585) des Luis Frois, = Portugiesische Forschungen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2. Reihe, Bd. 7, Münster 1988, S. III: “他們的許多習俗是這樣的怪僻、陌生，同我們的習俗相差如此之大，以至於似乎令人難以置信，有着這樣的制度、充滿如此活力精神以及擁有這樣的自然知識的人們，竟然與我們是如此的不同。” (“E são muitos de seus costumes tão remotos, peregrinos e alongados dos nossos que quasi parese incrível poder aver tão opposita contradisção em gente de tanta policia, viveza de emgenho e saber natural como tem.”) 請參考：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32ff. 有關早期報道者，見：Cooper, Michael, *Frühe europäische Berichte aus Japan*, in: D. Croissant u. L. Ledderose (Hgg.), *Japan* (見註 3), S. 46-55. 關於日荷接觸的意義可參看 Vos, Ken, *Dejima und die Handels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Niederlanden und dem vormodernen Japan*, in: ebd., S. 72-82.
- (26) 例如 Moréri, Louis,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 Neuauflage Paris 1732, 或者 Charlevoix, Pierre-François-Xavier d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Japon*, 2 Bde., Paris 1736.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807 bzw. II, S. 338.
- (27) J. P. Maffei, *Libri* (見註 14), S. 207v; Botero, Giovanni, *Le [bzw. Delle] relationi universali*, 4 Tle., Venetia, 第 2 版. 1597/98, 此處 Tl. II/2, S. 97ff.; Hijija-Kirschner, Irmela, *Iaponia Insula - Die verspiegelte Fremde*, in: *Japan und Europa 1543-1929. Essays*, (展覽目錄，文集) Berlin 1993, S. 9-35, 此處 S. 11.
- (28) E. Jorissen, *Japanbild* (見註 25), S. 111f. mit Anm. 27, 引文見 S. 112 (1584 年 1 月 6 日書信)。
- (29)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126, 338.
- (30)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OAG) Tokyo (Hg.), *Engelbert Kaempfers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2 Bde. u. Kommentarband, Berlin u. a. 1980 [以下引此略為 E. Kaempfer, *Geschichte*], I, S. 101ff., 引文見 S. 111.
- (31)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362ff.;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1579-1592*, 第 2 版 hg. v. H. Terpstra, 3 Tle., = *Werken uitgegeven door de Linschoten-Vereeniging*, Bde. 57, 58, 60, 's-Gravenhage 1955/57, Tl. I, S. 115f., S. 116: “他們的所有那些做法、禮儀和禮貌規矩都與中國人是相反的。” (“... soo hebbense alle haer usancien, ceremonien,

- courtosyen, etc. t'eenemael verkeert als die van Chinen.”)
請參考：A. Montanus, *Gesandtschafften* (見註 21), S. 5, 這與受過歷史教育的傳教士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的記述相矛盾，根據中國的原始資料，他認為中國人是為了尋找能使人長生不老的藥草才到日本去的 (Martini, Martino, “Nachsatz vom Reich Japonia”, in: ders.,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 此處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05ff.).
- (32) 利瑪竇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Nicolaus Trigautius [Trigault; Hg.],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Ex P. Matthaei Riccÿ Commentarijs libri V, Ad S.D.N. Paulum V. ..., Augustae Vind. 1615* (以下略為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S. 24f. 請參考：Braudel, Fernand,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Bd. 1: *Der Alltag*, dt. München 1985, S. 306-312, 其中指出，中國人兩種坐姿都會採用，相應地，也使用兩種不同的傢俱：已被日本人所接受的老式傢俱和從 13 世紀開始被採用的“歐式”傢俱。
- (33) Nitobe, Inazo,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新版本. Rutland/Vm. u. Tokyo 1969, 12. 1977 重印。這本書寫於一百年前，但在我看來，它對於理解日本文化還一直具有着重要的意義。1980 年時，我的朋友和田卓朗 (Takuro Wada) 教授把這本書送給我，對此我深表謝意。不幸的是，和田教授已於 2006 年 8 月 21 日去世。
- (34)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20: “他們在宗教方面與中國人相接近。” (“Haer religie is by naer gelijck die van Chinen.”) 這一評論當然祇適用於佛教。
- (35) “他們像穆斯林一樣坐在地板上用餐，和中國人一樣用木片取用食物。” J. Alvarez (1547), 引文見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4.
- (36) Demel, Walter, *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 其中祇涉及對中國人外貌的描寫。Ein Beitrag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Rassentheorien,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5, 1992, S. 625-666, 意大利語增訂版單行本：同一作者, *Come i cinesi divennero gialli. Alle origini delle teorie razziali*, Milano 1997. 同題刪節版增加了若干歐洲人對日本人外貌的觀察描寫，同時出版了日文語。
- (37) 1515 年 1 月 6 日書信，收錄於 G. B. Ramusio (Hg.), *Navigazioni* (見註 12), I, 180 [280 是錯誤的]： “這些人很勤奮，擁有某些我們的品格。他們的視力不太精細，眼睛很小。” (“...gli huomini sono molto industriosi, & di nostra qualità, ma di piu brutto viso, con gli occhi piccolli.”) J. Alvarez 的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3.
- (38) 羅德里格斯 (Rodrigues) 報道，秀吉時代以降，日本人才開始用剃頭刀理髮，之前他們祇是把頭髮拔掉。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37.
- (39)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37: “他們身體素質很好並且品質優雅。” (“de muy buena disposición de cuerpo, bien sacados, gentiles hombres.”) S. 362.
- (40) Nieuhof, Joan,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 2 Tle., t'Amsterdam 1665, 此處 Tl. II, S. 56f. 請參考：Reichert, Folker E., *Goldlilien: Die europäische Entdeckung eines chinesischen Schönheitsideals, = Kleine Beiträge zur europäischen Überseegeschichte*, Heft 14, Bamberg 1993, 其中對裹小腳的問題進行了論述，小腳不僅是極度親昵的“情慾的標誌，也被看成並且主要是教養良好的象徵”。這一點在日本似乎祇是偶爾會被模倣。
- (41)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86. 請參考：例如 Naudé, Gabriel, *Considerations politiques sur les coups d'Estats*, 無出版地點，第 2 版. 1667, S. 84ff. 更多例子參看 F. E. Reichert, *Goldlilien* (見註 40), S. 7, 文中寫道，關於“三寸金蓮”的報道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和鄂多立克 (Odorico da Pordenone) 時代，但也指出，在 18、19 世紀時的歐洲人眼中，這一習俗主要被看成是一種“狂熱的風尚”。
- (42)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4f. 此外，伯納蒂諾·德·阿維拉·希龍 (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還贊揚了她們的性格，她們虔誠、值得信賴並且很少嗜酒。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40.
- (43)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1, S. 258ff. 令人不解的是，在范禮安看來，印度文化與中日文化截然相反。(出處同上, S. 280).
- (44) 這可以比方說從 *Neue / warhafft / außführliche Beschreibung / der jüngstabgesandten Japonischen Legation gantzten Reiß ...*, Dillingen 1587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63 - 以下略為 “Reiß”) 中看得清楚，文中寫道 “儘管人們也認為 / 日本人為白種民族 / 這種說法也可採信 / 因為日本是一個寒冷的國度 / 但 (或許由於長期的遠途旅行導致脫色) 日本男人的膚色卻大半呈油亮的棕色 /” (“gleichwohl man auch sagt / daß in Japon weisse Leuth sein / welches wol zu glauben / dieweil es ein kalt Land / Jedoch sein dise Japonischen Herren (villeicht wegen der so langen vnnd weiten Reiß etwas entfärbt) mehrers thails Oelbraun / ...”)
- (45) A. Montanus, *Gesandtschafften* (見註 21), S. 52.
- (46)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 S. 110. 現今關於肯普費的研究，主要見 Haberland, Detlef, 例如同一位作者的, *Zwischen Wunderkammer und Forschungsbericht - Engelbert Kaempfers Beitrag zum europäischen Japanbild*, in: D. Croissant u. L. Ledderose (Hgg.), *Japan* (見註 3), S. 83-93, S. 83 錯誤地認為，肯普費的著作 “一開始對歐洲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參看下面注釋 (53) 中所提到的文獻。
- (47) Diogo de Couto, *Da Asia de...*, 14 Bde., Lisboa 1778-1788, 此處 Bd. II/2 (Dec. V, liv. XIII, cap. XII), 266: 日本人

“比中國人更白 (hommes mais alvos, que os Chins)”. 參看有關對日本人描述的彙編: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24), S. 37: 日本人的皮膚並不像北方諸民族那樣極為蒼白, 祇是呈現出比較適中的白色。 (“The Japanese are white, although not excessively pale as the northern nations but just moderately so”) (João Rodrigues Giram, 1604); S. 38: 婦女的膚色較為蒼白, 還比較漂亮。 (“The women are moderately pretty, with a rather pale complexion ...”) (Francesco Carletti, ca. 1600, gedruckt 1701); S. 39: 婦女皮膚較白, 外表通常也很好看。 (“The women are white and usually of goodly appearance”) (Bernadino de Avila Girón, 1604), 或者也見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288: 棕色的外表 (“brauner Gestalt”) (O. van Noort, 1601); S. 376: 婦女很白, 但缺乏血色 (J. Saris, 1617); S. 460f.: 男人 “相當得白” (“ziemblich”), 婦女則是 “極端得白” (“gar weiß”) (C. C. Fernberger, 1621/28); S.585: “與西班牙人的膚色不同” (“an Farbe den Spaniern nicht ungleich”) (C. Schmalkaldenz, 1642/52); S. 612: 日本男人皮膚為 “黃色/他們的妻子則比較矮小並且較白 / 因為她們很少外出” (“gelb / jhre Weiber aber kurtz vnd weiß / weil sie nicht viel außkommen”); S. 633: “像歐洲人一樣白 (weiß wie die Europßer)” (M. Thevenot, 1663); S.660: “黃褐色” (“Geel-Braun”) (C. Hazart dt. 1678, nld. 1667/71); S. 678: 男人的膚色為 “黃色” (“gelblich”), 婦女則因為 “大都待在家中 / 像歐洲人 / …… 一樣白 (“mehrentheils in Häusern bleiben / ... so weiß / als die Europeer sein mügen”) (J. Andersen, 1669). 達克·龐帕 (D. G. Pomp), 第一位到日本的荷蘭人, 也認為大多數日本人的皮膚是白色的。 Kootte, Tanja G., *A Distant Land of Silver*, in: van Raay, Stefan (Hg.), *Imitation and Inspiration. Japanese Influence on Dutch Art*, Amsterdam 1989, S. 7-13, 此處 S. 8. 紐霍夫也發現日本人與歐洲人的區別很小: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40), II, S.56.

- (48)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Bde., Paris 1735, 此處 Bd. 2, 80: “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居民面部的膚色, 並不是像某些人判斷的那樣, 原本就如同我們所見的那般。事實上, 在這些省份由於常年高溫, 人們的面色才呈現出被陽光曬過的黝黑和橄欖色。但是其它省份的中國人生來就和歐洲人一樣白。” (“La couleur de leur visage n'est pas telle que nous le disent ceux qui n'ont vu de Chinois, que sur les côtes des Provinces Méridionales. A la vérité, les grandes chaleurs qui regnent dans ces Provinces ... donnent aux Artisans & aux gens de la campagne, un teint basané & olivâtre; mais dans les autres Provinces, ils sont naturellement aussi blancs qu'en Europe ...”).

- (49) 請參考: 例如 Cameron, Nigel,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New York u. Tokyo 1970, S. 150 引用聖沙勿略的話: Pedro Morejón, *Historia y relación de lo sucedido en los reinos de Iapon y China, ... desde el año de 615 hasta el de 19*, Lisboa 1621, S. 104v: “白色的民族” (“gente blanca”); N.Trigault, *De expeditione*, S. 65: “中國民族整體上講是較白的民族, 但在靠近熱帶地區的幾個省份中, 人們的膚色較黑。” (“Sinica gens ferè albi coloris est, nam nonnulli è prouincijs ob vicinitatem zonae torridae subfusi sunt.”) 方濟各會修士保羅·達·耶穌 (Paolo da Gesù) 寫給教皇葛雷古爾十三世 (Gregor XIII) 的信, 其中主要對他在廣東見到的中國人進行了描述 (!): “他們膚色為白色” (“sono di color bianco”) (引自 Marcellino da Civezza, *Storia universale delle Missioni Francescane*, Bd. VII/2, Prato 1891, S. 899); 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第3版 Coloniae 1654, S. 19f.. 韃靼人與中國人相同 “是白顏色的” (“albo colore”); Henri de Feynes, *Voyage fait par terre depuis Paris Jusques à la Chine*, Paris 1630, S. 164, 稱中國人的皮膚 “非常的白” (“fort blanc”), 相應地 Samuel Purchas, *Haklvyt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4 Bde., London 1625, Bd. III, S. 410: “非常白” (“very white”),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遊記作家 Johann Christoph Wagner, *Das m_chtige Kayser=Reich Sina/ und die Asiatische Tartarey ...*, Augspurg 1688, S. 139: 中國女性總體看來 “美麗 / 可愛並且優雅 (……) 有着白色的皮膚和棕色的眼眸” (“insgemein überaus schön/ lieblich und anmuthig ... weiß von Haut und Braun von Augen”). 更詳細的研究見: W. Demel (見註36) 的各種出版物。與中國人相似, 1750年以後歐洲的作者們就很少地把日本人描述為 “白種人” 了。參看原始資料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I, S. 433: “鉛色的” (*Allgemeine Historie der Reisen zu Wasser und zu Lande*, 1747/74), S. 486: “橄欖色” (F. M. Abbé de Marsy, dt. 1756), S.507: “面色為棕色” (I. Kant, 1756ff.), S. 744: “通常為黃色, 但也有些人更傾向於棕色或白色”。
- (50)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17), S. 24. 關於日本人的勤奮,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296, 354, 等多處。
- (51) Raynal, Guillaume-Thomas[-François], *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10 Bde., Genève 第3版. 1781, 此處 Bd. I, S. 120ff., 151.
- (52) J. P. Maffei, *Libri* (見註14), S. 206: “對於生活中的種種艱難——饑餓、焦渴、高溫、嚴寒、熬夜以及身體上的疲勞, 他們都以令人欽佩的耐力忍受了下來。即便是在最寒冷的冬天, 新生兒也會被立刻帶到河中洗澡。” (“Mortalitatis incommoda, famem, sitim, æstum, algorem,

- uigilias, laboresque admirabili patientia tolerant. in lucem editi, uel hyeme summa, protinus lauandi ad flumina deferuntur.”)
- (53) 歐維士筆下的這種性格特徵，請參考：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63f. 日本人使托雷斯想到了古羅馬人：感覺敏銳、驕傲、好戰、缺乏耐心、果斷勇敢、為榮譽而戰、尊敬長輩、為保守承諾而竭盡全力並對通姦這樣不體面的行為極為厭惡。但就托雷斯所言，他們很少顧及法律，多用武力解決爭端。在托雷斯看來，那是一個京城之外的行省統治者掌握權力的時代。D. F. Lach, *Asia* (見註2), I/2, S. 677f. 可參看到1640年時的原始資料，M. Cooper (Hg.), *Japan* (見註24), S. 42ff., 18世紀時 Karl Peter Thunberg 的文獻：[...] *Reisen nach Afrika und Asien, vorzüglich in Japan, während der Jahre 1772 bis 1779, dt. Übersetzung von 1792*, 這裡引自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I, S. 741f. 關於這一時期完全一致的德國日本觀：Kreiner, Josef, *Deutschland - Japan. Die frühen Jahrhunderte*, in：同一作者, (Hg.), *Deutschland - Japan. Historische Kontakte, = Studium universale*, Bd. 3, Bonn 1984, S. 1-53, 此處特別是 S. 20; Kapitza, Peter,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in: Kreiner, Josef (Hg.), *Japan-Sammlungen in Museen Mitteleuropas. Bonner Zeitschrift f. Japanologie* 3, S. 49-57; 同一作者, Engelbert Kaempfer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Zur Wirkungsgeschichte seines Japanwerks im 18. Jahrhundert, in: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30), *Kommentarband*, S. 41-63. 19世紀時的日本學權威濟博爾特 (Philipp Franz v. Siebold) 也有相似的印象。他對此的描述參看 Scuria, Herbert (Hg.), *Reisen in Nippon. Berichte deutscher Forscher des 17. und 19. Jahrhunderts aus Japan*. Engelbert Kaempfer - 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 -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Berlin/DDR 1969, 此處 S. 370, 388, 420, 437, 442, 465, 503, 508, 516, 537, 543.
- (54) Raiß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155f., 引文見 S. 155).
- (55) Fr [ançois] Carons, und Jod. Schouten, *Wahrhaftige Beschreibungen zweier mächtigen Königreiche / Jappon und Siam ... Denen noch beigefüget Johann Jacob Merckleins Ost=Indische Reise*, dt. Nürnberg 1663 [以下略為 F. Caron, *Beschreibungen*], S. 114f. 對於在東亞廣泛存在的墮胎以及販賣、遺棄和殺害兒童的行為歐洲人總是極力批判的。參考：例如 Barrow, John,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1804, S. 167ff.; Meiners, Christoph, *Ueber die Natur der Völker ...*, in: *Göttingisches historisches Magazin von C. Meiners*, u. L. T. Spittler, Bd. VII/2, Hamburg 1790, 此處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S. 788——一個極為複雜的課題，對此基督教觀念起了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 (56)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30), II, S. 194.
- (57)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l'esprit des lois*, 2 Bde., Paris (ed. Garnier-Flammarion) 1979, 此處 XIX, 16.
- (58) 第一位來華傳教士羅明堅 (Ruggiero) 1584年1月25日在澳門寫的一封信，收錄於 *Nvovi Avvisi del Giapone, con alcuni altri della Cina del LXXXIII, et LXXXIV. Cauati dalle lettere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Venetia 1586, S. 171：“在這些中國人那裡，人們首先必須充份運用技巧，並且以友好的克制方式行事，而不是運用不得體的火一般的熱情。”(“Con questi Cinesi bisogna procedere cō gran destrezza et soauità, et non con feruori indiscreti.”)
- (59)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32), II, S. 194.
- (60) Pantoja, Diego, *Carta del Padre - ... para el Padre Luys de Guzmán Prouincial en la Prouincia del Toledo. Su fecha de Pequim ... a nueue de Março de mil y seyscientos y dos años*, Sevilla 1605, S. 115v; 請參考：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40), II, S. 37; Pinot, Virgile,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1932, S. 407; Guy, Basil, *The French Image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Voltaire*, = Besterman, Theodore (Hg.),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d. 21, Genève 1963, 此處 S. 230.
- (61) Fernandez Navarrete, Domingo,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 S. 71.
- (62) F.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見註13), II, S. 207f.; 請參考：Gaspar da Cruz, in: Boxer, Charles Ralph,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r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 P. Fr. Martín de Rada, O.E.S.A.*, London 1953, S. 142.
- (63)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17), S. 119f.
- (64)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40), I, S. 47: “Is dit in't Heidendom? Wy zyn in't Parad_s.”
- (65) D. Pantoja, *Carta* (見註60), S. 112.
- (66)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32), S. 70ff.;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40), II, S. 41.
- (67) D. Pantoja, *Carta* (見註60), S. 72v; Alvarez, 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63.
- (68)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40), I, S. 45ff.
- (69) Nach C. R. Boxer, *South China* (見註62), S. 287.
- (70) 例如：D. Pantoja, *Carta* (見註60), S. 73v.
- (71)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32), S. 71.
- (72) Merklein, Johann Jacob [Jacob], *Journal ...*, Nürnberg 1663, 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637.
- (73)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55), S. 111.
- (74) 關於中國：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17), S. 36：“最為乾淨”(“grandísima limpieza”)；關於日本，例如：Rodrigo de Vivero, *Relacion* [17世紀初], nach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2), I, S. 354.

- (75) 例如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59.
- (76)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 S. 88, 認為, 比如在南昌豬是很常見的, “以至於人們不能夠在街上行走”(“dat men de straten nauliks gebruiken kan”). 但是街道上並不是特別的髒, 因為糞便被收集起來並被賣到鄉村。在日本由於缺乏肥料情況也是如此, 這可以用來解釋那裡傳染病較少流行這一事實。Hanley, Susan B., “Tokugawa society: material cultur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life-styles”, in: J. W. Hall (Hg.), *History* (見註 2), S. 660-705, 此處 S. 697f., S. 679 提到, 在近代早期, 日本的衛生標準絕對比歐洲要高, 但還不若今天高出那樣多。
- (77) Semedo, Álvaro [bzw. Semedo, Alvarez], *Imperio de la China i cvltvra evangelica en èl, por los Religiosos de la Compañia de IESVS*, hg. v. M. de Faria i Sousa, Madrid 1642, S. 36: “(這裡請允許我這樣說, 因為到處見到這種引人注目的有遠見地使用這種物品的圖景) 保持廁所清潔, 這在每個家庭中都都很普遍。人們在街上和商店裡賣這些紙張, 卻絕對不允許在上面寫上字, 因為這被認為是一種褻瀆。”)(“... permitasenos el dezirlo, porque todo son imagenes de atencion, i providencia en el uso de las cosas) para limpieza en las latrinas generales en toda vivienda. Este se vende por las calles, ademas de averle en las tiendas; i en ninguna manera ha de ser escrito, porque a tener qualquiera letra, es entre ellos sacrilegio el usar d_l en esta parte”).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173f., 其中描述到, 在日本不論是廁所, 還是澡堂都是極為衛生的。
- (78)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8* ..., 引文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12.
- (79) 參考: 例如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46f.;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257.
- (80) 關於中國例如 Gaspar da Cruz (in: C. R. Boxer, *South China* (見註 62), S. 149f.),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 S. 115; D. Fernández Navarrete, *Tratados* (見註 61), S. 16. 關於日本例如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9ff., 187, 同書第 10 頁稱日本男人 “在肉體上很是忠誠”。
- (81) 因此, J. Alvarez: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4f. 參考: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64ff.;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58f., 687; Souyri, Pierre F., *Luís Fróis et l'histoire des femmes japonaises*, in: R. Carneiro u. A. Teodoro de Matos (Hgg.), *Século* (見註 20), S. 629-644, 文中斷定, 與後來形成對比, 13-16 世紀時的日本婦女相對自由——甚至有要求強制離婚的可能性, 儘管形式上的步驟必須由丈夫來完成。
- (82)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113; Varenus, Bernhardus, *Descriptio regni Japoniae*, Amsterdam 1649, 此處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74f. 文中論述, 對日本男人來說, 婦女祇是滿足慾望和消遣的對象以及生孩子的工具。
- (83) 例如: Martin de Rada (in: C. R. Boxer, *South China* (見註 62), S. 182f.);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39; A. Semedo, *Imperio* (見註 77), S. 48. 一般看來, 18 世紀時的日本婦女似乎比中國婦女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 參看 Thunberg, Carl Peter, *Resa uti Europa, Africa, Asia, förrättad åren 1770-1779*, 4 Bde., Upsala 1788/93, 此處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724.
- (84) D. Fernández Navarrete, *Tratados* (見註 61), S. 71.
- (85)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 S. 107, 102: “meer spraak als de man zelf”.
- (86)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99: “很少愛真理”(“veritatis parum amans”).
- (87) 請參考: V. Pinot, *Chine* (見註 60), S. 83.
- (88) S. Purchas, *Pilgrimes* (見註 49), III, S. 339.
- (89)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05;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 S. 71, 109, 126. 關於這點和相關內容參看 W. Demel, *Fremde* (見註 11), S. 152ff.
- (90) A. Semedo, *Imperio* (見註 77), S. 37f.: “Sachar las pechugas a una perdiz, i ocupar los huecos dellas con otra cosa i cerzir la rotura por donde ellas salieron, se haze cõ tal maestria, que si el comprador no es algun Argos ... se ve con solas plumas i huessos”; “lo que es màs, pintarle de manchas apetitosas ... i de colores naturales, eligiendo para la venta lo màs dudoso del crepusculo del día”.
- (91) Gaspar da Cruz, 此處據 C. R. Boxer, *South China* (見註 62), S. 129.
- (92) Montesquieu, *Esprit* (見註 57), XIX, 20; Magaillans [bzw. Magalhães], Gabriel de,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Paris 1688, S. 167.
- (93) 據 V. Pinot, *Chine*, S. (見註 60) 392.
- (94) Rousseau, Jean-Jacques, *Discours* 1. T1., in: ders., *Œuvres complètes* (ed. Gallimard), 5 Bde., Paris 1990/95, 此處 Bd. III, S. 11: (以及以下部分)。
- (95)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47f., 260ff.
- (96)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3.
- (97) J. Alvarez (1547) 以及 F. Xaver (1552), 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3, 80.
- (98) 例如 Andersen, Jürgen 對此表示出的更多是欽佩之情, 參看 *Orientalische Reise=Beschreibung*, Schleswig 1669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78);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92, 迷信希望昇入想象中的天堂的結果, 參看 A. Montanus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95), 關於兒童面對死亡的勇氣: Francisci, Erasmus, *Neu-polirter Geschicht= Kunst= und Sitten=Spiegel ausländischer Völcker* ..., Nürnberg 1670 (ebd. I, S. 772f.).

- (99) F.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見註 13), II, S. 152 :
“..... 中國人並不是戰士。除了戰爭經驗很少之外，他們的膽子也很小，武器裝備也較差，砲兵更是極為缺乏。”
“... os Chins não são muito homens de guerra, porque além de serem pouco práticos nela, são fracos de ânimo e algum tanto carecidos de armas, e de todo faltos de artilharia.”)
- (100) Palafox y Mendoza [Mendoza], Juan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Paris 1670, 225ff. (以及以下部分)。
- (101) Demel, Walter, *China im 17. Jahrhundert - Kriegsgebiet oder Friedensreich?* in: Asch, Ronald (Hgg.), *Frieden und Krie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ünchen u. Paderborn 2001, S. 543-560.
- (102) C. R. Boxer, *South China* (見註 62), S. 28.
- (103) 這種關於佔領中國的計劃在大約 1570 年以後變得逐漸多起來。D. F. Lach, *Asia* (見註 2), I/1, S. 297ff.
- (104)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81, 86f.; D. Pantoja, *Carta* (見註 60), S. 123f.; Herrera [y Tordesillas], Antonio, *Historia general del mundo ...*, 2 Bde., Madrid 1601, 此處 Bd. 2, S. 49, 54. 西班牙方面也曾考慮過要佔領日本，這在 1579 年被范禮安認為是荒唐的。另一方面，稍後秀吉對朝鮮的侵略失敗也證明了日本對(西屬)菲律賓並不構成威脅。他們的船隻畢竟太差了。J. F. Moran, *Japanese* (見註 14), S. 53.
- (105) D. Pantoja, *Carta* (見註 60), S. 89v : “他們祇是用拳頭來毆打對方，扯對方的頭髮，然而幾句話過後，他們又成為朋友了。”(“reñir con armas, mas su reñir es darse algunas puñadas, descabelarse, y tirarse de la melenas, y en dos palabras quedan amigos.”)
- (106) 引自 Kaminski, Gerd u. Unterrieder, Else, *Von Österreichern und Chinesen*, Wien u. a. 1980, S. 22.
- (107) G. B. Sansom, *Japan* (見註 15), S. 415f.
- (108) 請參考：例如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83, 92.
- (109) A. Herrera [y Tordesillas], *Historia* (見註 104), II, S. 54; Guzman, Luis de,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que han hecho los religios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para predicar el sancto Euangelio en la India Oriental, y en los Reynos de la China y Japon*, Bd. I, Alcalá 1601, S. 322.
- (110) Le Comte, Louis [Hg.],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3 Bde. (Bd. III von Le Gobien, Charles), Paris Bde. I u. II, 第 3 版 1697, Bd. III 1698, 此處 Bd. I, S. 35.
- (111) 弗蘭基 1705 年 10 月 15 日給巴爾塔扎·米勒 (Balthasar Miller) 的信，收錄於 [Neuer Welt=Brot ...]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 Schrif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Iesu Aus Beyden Indien ... angelangt seind*, hg. v. J. Stöcklein bzw. P. Probst bzw. F. Keller, 5 Bde. in 10 Halbbänden bzw. 38 Teilen, Augsburg u. Grätz [Graz] bzw. Wien Bd. I/1-4 第 2 版 1728, Bd. I/5-V 第 1 版 1726-1761, 此處 Bd. I/5, S. 41.
- (112) D. Fernández Navarrete, *Tratados* (見註 61), S. 30f.
- (113) Unverzagt, Johann Georg, *Die Gesandtschaft Ihro Kayserl. Majest. [sic!] von Groß=Rußland an den Sinesischen Kayser*, Lübeck 1725, S. 164.
- (11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551ff.] hg. v. M. Lopes de Almeida, 2 Bde., Porto 1979, 此處 Bd. I, S. 919; Goes, Damiam de [Góis, Damião de], *Chronica do felicíssimo Rei Dom Emanuel*, Ti. IV, Lisboa 1567, S. 31v : “他們在機械方面的技藝比其他的民族更高。”(“em cousas de arte mecanica passam todallas nações do mundo.”)
- (115)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40; J. P. Maffei, *Libri* (見註 14), S. 94v.
- (116) Le Roy, Loys [Louis],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 ...*, Paris 第 3 版 1579, S. 93.
- (117) D. Pantoja, *Carta* (見註 60), S. 78.
- (118)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12ff. 特別是 S. 18ff., 24f..
- (119) 參看 B. Varenius 的評論：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79, 關於北京宮廷由太監所創的多樣性音樂：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 S. 46.
- (120)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39.
- (121)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36ff.; [Le Jeune, Pierre-Claude], *Observations critiques et philosophiques sur le Japon et sur les Japonais*, Amsterdam u. Paris 1780, dt. *Krit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über Japan und die Japaner* [1782],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690, 其中把中國人和日本人描述為“熟練的模倣者，而非發明者”。
- (122) Charlevoix, Pierre-François-Xavier de, *Histoir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progrès et de la décadence du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du Japon ...*, Rouen 1715, 此處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127f.
- (123) 可參看利瑪竇對中國繪畫的評論：“他們不懂得用油彩作畫，也不會在畫中運用陰影，因此他們的繪畫是死的，沒有生氣。”引自 Thiel, Josef Franz, *Die christliche Kunst in China*, in: Ders. (Redakteur) / Haus Völker und Kulturen, St. Augustin (Hg.), *Die Begegnung Chinas mit dem Christentum*, (展覽目錄) St. Augustin 1980, S. 27-51, 此處 S. 42.
- (124) 例如 Vivero, Rodrigo de, “Relacion, y noticias, de el reino del Japon” (手稿),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354.
- (125) B. Varenius, 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82f., 引文見 S. 583.

- (126) 請參考 Demel, Walter, *Abundantia, Sapientia, Decadencia - Zum Wandel des Chinabildes vom 16. bis zum 18. Jahrhundert*, in: Bitterli, Urs u. Schmitt, Eberhard (Hgg.), *Die Kenntnis beider "Indien" im frühneuzeitlichen Europa*, = *Akten der Zweiten Sektion des 37.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s in Bamberg 1988*, München 1991, S. 129-153.
- (127) 請參考 Budde, Hendrik, *Japanische Farbholzschnitte und europäische Kunst. Maler und Sammler im 19. Jahrhundert*, in: D. Croissant u. L. Ledderose (Hgg.), *Japan* (見註 3), S. 164-177, 此處 S. 164f.; 同一作者, *Japanmode in Europa*, in: ebd., S. 425f.
- (128) Raiß,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7f., 引文見 S. 157.
- (129) 請參考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58. 日本人三好忠良 (Tadayoshi, Miyoshi) 甚至提到過, “日本人憧憬遙遠的大陸並且偏愛異域題材。” 同一位作者, *Japanische und europäische Kartographie vom 16. bis zum 19. Jahrhundert*, in: D. Croissant u. L. Ledderose (Hgg.), *Japan* (見註 3), S. 37-45, 引文見 S. 40.
- (130) W. Demel, *Fremde* (見註 11), S. 107f. 這些器械似乎在運輸過程中已經部分損壞了。
- (131) Zechlin, Egmont, *Die Ankunft der Portugies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als Problem der Univers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57, 1938, S. 491-526, 此處 S. 520ff.; Villiers, John, “The Portuguese and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P. Milward (Hg.), *Voyages* (見註 12), S. 3-13, 此處 S. 3f.
- (132) M. M. Silva u. J. M. Álvarez, *Ensaíos* (見註 18), S. 121ff.
- (133) 請參考: 例如 Vos, Ken, *Les Hollandais au Japon*, in: *Oranda* (見註 6), S. 10f., 文中強調, 日本在 18 / 19 世紀時還屬於歐洲人不太熟知的國度, 僅僅是因為它遙遠的距離和品質良好的非模倣產品而出名。
- (134) “Jüngste Zeytung auß der weitberühmten (!) Insel Jappon ...”, Dillingen 在 1586 年就已經報道, 日本人對印刷術的瞭解比歐洲人更早, “因為日本人並不知曉他們是從何時開始運用這一技術的。” (“sintemalen man von jren Anfang nit weiß”)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0).
- (135) 請參考: 例如 B. Varenius,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80.
- (136)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1, S. 263.
- (137) 至少賴斯 (Raiß) 是持這種觀點的, in: Kapitza (見註 2), I, S. 155.
- (138) 關於日本: Franz Xaver an das Jesuitenkolleg in Coimbra, Kangoshima, 5.10.1549, in: G. B. Ramusio (Hg.), *Navigazioni* (見註 12), I, S. 381, 383; Brief aus Cochín v. 29. 1. 1552,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80; 關於中國: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20.
- (139) 例如, 關於沙勿略對日本的描述 (參考: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65, 事實上此書中指的是修道院), 關於中國: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99.
- (140) Noël, François,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Pragae 1711, Vorrede.
- (141) G. de Magaillans, *Relation* (見註 92), S. 109.
- (142) Medhurst, W [alter H.],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ly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1838, S. 171: “在中國精通文字的人數大得驚人, 男性人口中的一半都能夠閱讀。”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acquainted with letters in China, is amazingly great, One half of the male population is able to read.”) 16 世紀時的佛羅易士已經發現, 身份高貴的日本婦女幾乎都會書寫, 與之相反歐洲婦女卻很少能夠書寫。Costa-Lopes, Ana Maria, “Imagens do Japão. ‘Do que toca as mulheres, e de suas pessoas e costumes’ no Tratado de Luís Fróis”. in: R. Carneiro u. A. Teodoro de Matos (Hgg.), *Século* (見註 20), S. 591-601, 此處 S. 597.
- (143) Nipperdey, 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München 1983, S. 463.
- (144) 請參考: 例如 Franz Xavers Brief v. 29.1.1552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79f.), 以及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19.
- (145) 例如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27f.; Raiß, in: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9.
- (146)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88.
- (147) D. Pantoja, *Carta* (見註 60), S. 90v.
- (148) 例如 Rhodes, Alexandre de, *Sommaire des divers voyages et missions apostoliques du R. P. --- ... à la Chine &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 Paris 1653, S. 25. 第一位來華傳教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o) 便這樣認為, 他在 1583 年的一封信中——再錄於 *Nvovi Avvisi* (見註 58), 引文見 S. 162——寫道, 筆劃組合無限多的可能性使得中國文字是這樣的難, “中國人自己也要花上幾年的工夫才能學會” (“che gl'isteBi Cinesi vi spendono gli anni”). 黑格爾認為, “在象形文字[意指漢語]中, 具體的精神層面上的各觀念之間的關係必定是混亂和難以區別的。” 引文據 Song, Du-Yul, *Aufklärung und Emanzipation. Die Bedeutung des asiatischen Welt bei Hegel, Marx und Max Weber*, Berlin 1987, S. 22.
- (149) J.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00), S. 225ff.
- (150) 武士們應像對武器那樣以同等的認真態度把精力投入到文學中去, 這在所謂的德川體制時便確定了。在內戰結束和鎖國時期開始後, 武士由受封的領主封臣轉變成了領取俸祿的官吏。G. B. Sansom, *Japan* (見註 15), S. 446; Hall, John Whitney, *Das Japanische Kaiserreich*, =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 20, Frankfurt/M. 1968, S. 195f.
- (151) [P.-C. Le Jeune], *Observations*, dt. Bemerkungen (見註

- 151),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685ff. (請參考例如如上所引, S. 339, 466, 509).
- (152)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29ff.;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19ff.
- (153) B. Varenus, 據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578f., 引文 S. 578.
- (154) 例如 F.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見註 114), I, S. 919;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04f., 他對中國借風而行的交通工具的構造大加贊揚, 此外他還在家鄉荷蘭發現了類似的做製品。
- (155) Acosta, José, *Historia natv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Sevilla 1590, S. 406; A. Herrera [y Tordesillas], *Historia* (見註 104), II, S. 47;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29; A. Semedo, *Imperio* (見註 77), S. 71f., 76ff.;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19.
- (156) M. Tadayoshi, *Kartographie* (見註 129), S. 38.
- (157) G. de Magaillans, *Relation* (見註 92), S. 75.
- (158) Aduarte, Diego,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Iapon, y China*, 2 Tle., Manila 1640, S. 118; Kircher, Athanasius, *China Monumentis quâ Sacris quâ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et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mstelodami 1667, S. 98, 169; A. de Rhodes, *Sommaire* (見註 148), S. 20f.
- (159) 請參考: 早在 Haithonus Armenus, *De Tartaris liber* [1307 (!)], in: Grynaeus, Simon, *Novvus orbis regionvm ac insvlarvm veteribus incognitarvm*, Basileae 1532, S. 419; Pufendorf, Samuel, *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VIII, 1672], hg. v. G. Mascovius, Frankfurt/M. u. Leipzig 1759, 重印 Frankfurt/M. 1967, II, 3 § 7: “中國人有兩隻眼睛, 歐洲人有一隻眼睛, 其他的民族都是瞎子。” (“Iamdudum a Chinensibus Europaeis vnus duntaxat oculus relictus, caeteri coecitatis damnati.”)
- (160) 例如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06.
- (161) 據 Watson, Walter, *Interpretations of China in the Enlightenment: Montesquieu and Voltaire*,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Bd. 2: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aris 1980, S. 16-37, 此處 S. 16, 在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中, 中華文化究竟有多麼悠久這一問題在 17 和 18 世紀一直是爭論的焦點。Mungello, David,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 *Studia Leibnitiana, Supplementa*, Bd. 25, Stuttgart 1985, S. 102f., 124ff.
- (162) 引自 Dawson, Raymond,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u. a. 1967, 此處 S. 68.
- (163) V. Pinot, *Chine* (見註 60), S. 416.
- (164) B. Guy, *Image* (見註 60), S. 302.
- (165) Armogathe, Jean-Robert, *Voltaire et la Chine: Une mise au point*,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u sinologie*, Bd. 1: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76, S. 27-39, 此處 S. 28, 33ff.; G. Kaminski u. E. Unterrieder, *Österreicher* (見註 106), S. 39, 47.
- (166) N. Cameron, *Barbarians* (見註 49), S. 150; G. de Magaillans, *Relation* (見註 92), S. 109.
- (167) 例如 Bouvet, Joachim,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 S. 146f.; A. Kircher, *China* (見註 158), S. 169, 212.
- (168) Wolff, Christian, *Rede von der Sittenlehre der Sineser* [1721], in: *Gesammelte 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 6 (Halle 1740), = J. École u. a. (Hgg.), *Christian Wolff. Gesammelte Werke*, 1. Abt., Bd. 21/6, Hildesheim u. New York 1981, S. 529-662, bes. S. 236, Anm. 140. 與沃爾夫相反的觀點, 例如 Bachmann, Hanns-Martin, *Die naturrechtliche Staatslehre Christian Wolffs*, = *Schriften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27, Berlin 1977, S. 38ff.
- (169)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90: “君王、公爵、伯爵、諸侯以及家臣”(“Príncipe, Duque, Marqués, Conde, Señor de vasallos”); 請參考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04. 杜赫德 (Du Halde) 在 *De la Noblesse* (論貴族) 一書中以“在中國, 貴族並不是世襲的 (……)” (“La nobless n'est point héréditaire à la Chine ...”) 開頭的一章中寫道, 祇有皇族成員、(當時的)官員、雖未經科舉考試但已獲得某種榮譽稱號的文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以及孔夫子家族才屬於貴族。J. - B. Du Halde, *Description* (見註 48), II, S. 58ff., 引文見 S. 58.
- (170) 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25: “即使這些哲學家不直接統治國家的話, 帝王本身也會用哲學家的話來統治國家。” (“...tametsi huic regno Philosophi non imperent, dici tamen debet, Reges ipsos a Philosophis gubernari.”) 請參考: Bartoli, Daniello,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Terza parte dell'Asia: La Cina*, Roma 1668, S. 12. “好的學者乃是帝國的全部命脈” (“buoni Letterati, cioè tutta la nobilità di quel Regno”).
- (171) Wolff, Christian, *Von den Regenten, welche sich der Weltweisheit befleißigen, und von den Weltweisen, die das Regiment führen* [1730], in: *Gesammelte 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 6 (Halle 1740), = J. École u. a. (Hgg.), *Christian Wolff. Gesammelte Werke*, 1. Abt., Bd. 21/6, Hildesheim u. New York 1981, S. 529-662, bes. S. 530, 565f.;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Abrégé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es à Charlequint*, 3 Bde., La Haye 1753/55, 此處 Bd. 1, S. 18f.: 參考 Orieux, Jean, *Voltaire ou la royauté de l'esprit*, 2 Bde., Paris 第 2 版, 1977, 此處 Bd. II, S. 297f.;

- Demel, Walter,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1991, S. 45-64, S. 59.
- (172)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78;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53f.; J. F. Moran, *Japanese* (見註 14), S. 31, 他認為歐洲人的稱號 (Kaiser, König 等) 在日本並不適用, 並且通過自己的努力, 儘量避免誤解。
- (173) San Roman de Ribadeneyra, *Historia general de la Yndia Oriental*, Valladolid 1603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294ff., 此處 S. 297.
- (174)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81.
- (175)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54.
- (176) G. P. Maffei, *Libri* (見註 14), S. 208. 據馬菲分析在日本有五個階層, 分別是: 與歐洲高級貴族相似的統治階層, 僧侶階層, 由市民和在民事及軍事方面為國王服務的低級貴族組成的第三階層, 之後是小商人、工人和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 最後是農民。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從大約 17 世紀時起就開始瓦解了。G. Goodman, *Japan* (見註 20), S. 4.
- (177) 1549 年 1 月 1 日的信, 收錄於 G. B. Ramusio (Hg.), *Navigazioni* (見註 12), I, S. 377v-379v, 此處 S. 377v; G. P. Maffei, *Libri* (見註 14), S. 54f. 連少挺稱“皇帝”為“iacatay” (yakata 原意為宮殿, 官邸), 稱諸侯 - “在我們這裡被稱為公爵或伯爵” (“ghelijck by ons graven ende hertoghen”) - 為“cunixu” = kuni-shu bzw. koku-shu, 也就是大名, 又把較小的統治者稱為“tonos” - “這裡被稱為領土封臣” (“gelijk by ons baronen ende leen-heeren”) - 這顯然指的是武士。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18f.;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60f., 714. 關於皇帝的稱號參看: Demel, Walter, *Kaiser außerhalb Europas? Beobachtungen zur Titulatur außereuropäischer Herrscher zwischen “deskriptiver” Reiseliteratur und politischen Interessen*, in: Beck, Thomas u. a. (Hgg.), *Überseegeschichte. Beiträge der jüngeren Forschung*, = Rudolf v. Albertini, Eberhard Schmitt (Hgg.), *Beiträge zur Kolonial- und Überseegeschichte*, Bd. 75, Wiesbaden 1999, S. 56-75.
- (178) Ching, Julia, *Konfuzianismus und Christentum*, dt. Mainz 1987 (engl. 1977), S. 188ff.; Uitzinger, Ellen, *Het Keizerschap in China - Emperorship in China*, in: *De Verboden Stad. Hofcultuur van de Chinese keizers (1644-1911) - The Forbidden City. Cour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1644-1911)*, (展覽目錄) Rotterdam 1990, S. 71-91.
- (179) Valignano 引文見: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56; J. H.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見註 31), S. 118f., 引文見 S. 118: “他們是土地的絕對的主人” (“zijn absolutelicke heeren van't landt”).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8.
- (180) 引文據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57: “所知的世界上最偉大、最強勢的專制統治”(“the greatest and powerfulllest Tyranny, that ever was heard of in the world”). 從這層意義上講——還未涉及迫害基督徒問題, 馬菲就談到了“獨裁者織田信長”(“tyrannus Nubunaga”).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84).
- (181) F. Caron, *Beschreibungen*, S. 83f., 87f.; 參考: 例如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96, 關於中國: J. Barrow, John, *Travels* (見註 55), S. 371ff.
- (182) 托雷斯斯的觀點參看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41; 佛羅易士的觀點: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39.
- (183) A. Semedo, *Imperio* (見註 77), S. 184; L. Le Comte [Hg.], *Mémoires* (見註 110), II, S. 32f., 兩人都對法官的專橫行徑進行了描寫。
- (184) “最早期的報道強調物質財富、熟練的技術以及中國社會的複雜組織形式。中世紀後, 像克羅斯 (Cruz)、門多薩和馬菲等試圖找出其綜合情況的人就更傾向於強調中國在政治、教育及社會結構方面普遍存在的理性秩序。” (“The earliest accounts stress the material wealth, technological skills, and complex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ose who try after mid-century, like Cruz, Mendoza and Maffei, to present a synthesis tend to emphasize the rational order prevailing in China'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tructure.”)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821.
- (185) F.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見註 13), II, S. 166f., 180ff.;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ória* (見註 17), S. 97ff.
- (186)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260: “惡魔般殘虐”(“con una crueldad de demonios”), 他還認為 (S. 80), “以同樣的文明和勤奮的精神, 君王也管理司法正義的進行”(“El mismo cuidado y diligencia que este gran Príncipe tiene en que en su Reino se administre justicia con rectitud ...”); Parker, Robert, *The Historie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 ...*, London 1588, Amsterdam 1973 重印, S. 261.
- (187) 中國: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63; 日本: G. B. Ramusio (Hg.), *Navigazioni* (見註 12), I, S. 378;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268;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85ff.
- (188)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92;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見註 48), II, S. 136f. 顯然, 滿族人在統治之初並不實行這一溫和的政策: 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50f. 像伏爾泰這樣的死刑反對者當然深切同情這一人道主義行為 (請參考: 同一作者, *Œuvres complètes*, hg. v. Moland, Louis, 54 Bde., Paris 1877/85, Nendeln 1967 重印, 此處 Bd. XV, S. 81), 這在 17 世紀的作家看來“相當軟弱無力”(“ziemlich kraftlos” - so J. Nieuhof, 出處同上, S. 50) 甚或“極為軟弱無力”(見 Dapper, Olfert, *Gedenkwaardig Bedryf / Der Nederlandsche /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 en in het Keizerryk / van / Taising of Sina ..., Amsterdam 1670, S. 476).
- (189) 利瑪竇／金尼閣對這點特別強調，他們認為中國的官吏很專橫。N. Trigault, *De expeditione* (見註 32), S. 98.
- (190) 請參考：例如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3, 260.
- (191)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154ff.; Montesquieu, *Esprit* (見註 57), VI/13, XII/14.
- (192) 參看馬菲的觀點：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708.
- (193) 請參考：例如 Raiß,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5，對此的描述又見 Richard Cocks, ebd., S. 407，其他例子見 S. 451ff., 507, 752 等多處；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78f., 82, 91f.
- (194) 引文見 Tames, Richard, *Encounters with Japan*, New York 1991, S. 67 之前；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158ff.;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377f., 762.
- (195)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156, 161;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260.
- (196) 請參考：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151ff. 沙勿略在 1549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寫道，由於嚴厲的刑罰，日本的盜竊犯很少，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日本人這樣如此厭惡盜竊行為。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79.
- (197) L. Le Comte [Hg.], *Mémoires* (見註 110), I, S. 404f.
- (198) 歐維士 (1547) 的報道，收錄於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3.
- (199) F. Caron, *Beschreibungen* (見註 55), S. 29, 55f., 他估算，上層社會的總收入達到兩億八千三百萬荷蘭盾，合一億一千四百萬塔勒。A. Montanus, *Gesandtschafften* (見註 21), S. 55ff., 74. 關於乞討參看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183ff., 244, 259.
- (200) J.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見註 17), S. 68; Osorio, Hieronymus [Jéronimo], *De rebvs; Emmanvelis regis Lvsitaniae invictissimi virtute et avspicio ... gestis; libri duodecim*, 第 2 版. Coloniae Agrippinae 1574 [Erstauflage: Olysippone = Lissabon 1571], S. 411; Escalante, Bernadino de, *Discvrsio de la navegacion qve los Portugueses hacen a los Reinos y Proouincias del Oriente ...*, Sevilla 1577, hg. v. Sanz, Carlos, Madrid 1958 重印, S. 31v., 49. 拉達 (Martín de Rada) 在報道 (C. R. Boxer [Hg.], *South China* (見註 62), S. 294) 中指出，這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J. Nieuhof, *Gezantschap* (見註 40), II, S. 34ff. 部分地報道過乞食者的無恥。
- (201) Temple, Richard C. (Hg.),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Bd. III, London 1919, S. 303.
- (202)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hg. v. E. R. A. Seligman, 2 Bde., London u. New York 1970/72, 此處 Bd. I, S. 64.
- (203) 請參考 Eberhard, Wolfram, *Geschichte China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1971, S. 334ff.
- (204) 重農主義者的中國觀請參考：例如 W. Demel, *Abundantia* (見註 126), S. 142ff.
- (205) *Des Herrn Admirals, Lord Ansons Reise um die Welt ...*, hg. von Walter, Richard, Leipzig u. Göttingen 1749, S. 336. 這部著作到 1800 年時用六種不同的歐洲語言至少出版過五十版！
- (206) W. Demel, *Abundantia* (見註 126), S. 146ff.
- (207) C. P. Thunberg, *Resa* (見註 83)；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I, S. 713ff., 特別是 S. 713. 但圖恩伯格的觀點也有相當多的保留，例如：“雖然這個民族沒有學術、科學以及美好藝術光輝的照耀，但他在知識水準、洞察能力、文化和啟蒙方面的成就是這樣高，以至於使這成為可能。”(引文出處同上，S. 744).
- (208) I. Hijiya-Kirschner, *Insula* (見註 27), S. 12 (戈洛夫寧 [Golovnin] 也曾引用過)；J. Kreiner, *Deutschland* (見註 53), S. 32ff.
- (209) “編者的回憶”(“Nacherinnerungen des Herausgebers”), in: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416, 417. 這一評價可追溯到孟德斯鳩那時，例如黑格爾也同意這種看法。D. -Y. Song, *Aufklärung* (見註 148), S. 27ff., 特別是 S. 30.
- (210) 歐維士感覺到的是友好而非陌生，但沙勿略在他在這個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後很快地糾正了這一觀點。請參考 M. Cooper (Hg.), *Japan* (見註 24), S. 41f.; D. F. Lach, *Asia* (見註 2), I/2, S. 658, 669, 他在 671 頁提出論斷，日本人的好奇和懷疑使得他們無法把基督教學說排除在外。
- (211) “The first voiage of the English to the Island of Japan”, o. O. 1617, in: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385.
- (212)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194 (引文)，請參考：227, 265.
- (213) E. Kaempfer, *Geschichte* (見註 30), II, S. 394ff., 他在第 395 頁提到，一個民族能夠孤立存在的法則已被幾位最近的世界智者[= 哲學家]所否定。Vgl. dazu die ablehnenden “Nacherinnerungen” seines Herausgebers Dohm, ebd., S. 414ff. Wolff, Christian, *Jus gentium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um*, Frankfurt/M. & Leipzig 1764 的重版和譯本，= J. B. Scott,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2 Bde., Oxford 1934, hier § § 75, 187, 295-297.
- (214) Justi,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 *Die Chimäre des Gleichgewichts der Handlung und Schiffahrt*, Altona 1759, S. 22ff., Kluebing, Harm 作了討論：《Die Lehre von der Macht der Staaten. Das außenpolitische Machtproblem in de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und in der praktischen Politik im 18. Jahrhundert, = Historische Forschungen, Bd. 29, Berlin 1986, S. 95f. 稍後尤斯蒂寫了 *Vergleichungen der Europäischen mit den Asiatischen und*

andern vermeintlich Barbarischen Regierungen (Berlin u. a. 1762), 他在這部著作中 (S. 319ff.) 對自我孤立法則進行了維護。

- (215) 日本的開放當然並不僅僅是被迫的，這有其廣泛的必要性。但如果沒有佩里 (Commodore Perry) 的“黑船”，這件事可能不會如此快的達成。
- (216) Fisch, Jörg, *Die europäische Expansion und das Völkerrecht. 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um den Status der überseeischen Gebiete vom 15.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 v. Albertini, Rudolf u. Gollwitzer, Heinz (Hgg.), *Beiträge zur Kolonial- und Überseegegeschichte*, Bd. 26, Stuttgart 1984, S. 226, 256, 258.
- (217) Mittag, Achim, *Wer sind die "vortrefflichen Menschen im Westen"? Einige Randbemerkungen zur Wahrnehmung des Westens in China anhand einer Strophe aus dem "Klassischen Buch der Lieder"*, in: Müller, Winfried u. a. (Hgg.), *Universität und Bildung. Festschrift Laetitia Boehm zum 60. Geburtstag*, München 1991, S. 301-312, 引文見 S. 309, 請參考 S. 301: 在許多啟蒙思想家看來，中國人特別適合間離化的觀察，因為在他們自我發生並且至少同等重要的文化框架內，“具備了細緻且如漫畫般描述地進行觀察，特別是教育方面、道德誠實方面以及雖與日常準則相聯繫卻又完全理性地進行判斷的前提條件。”
- (218) Demel, Walte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 Ständische Gesellschaft und europäisches Mächtesystem im beschleunigten Wandel (1689/1700 - 1789/1800)*, Stuttgart u. a. 2000, S. 275ff.
- (219) I. Hijiya-Kirschner, *Insula* (見註 27), S. 13f.
- (220) P. Kapitza, *Aufklärung* (見註 53).
- (221) 引自 Schulin, Ernst,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rfassung des Orients bei Hegel und Ranke*, =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Max-Planck-Instituts f. Geschichte*, Bd. 2, Göttingen 1958, S. 245, Anm. 247.
- (222) J. Kreiner, *Bild* (見註 5), S. 21ff.
- (223) M. Cooper 的注釋，見同一作者 (Hg.), *Japan* (見註 24), S. 164.
- (224) 從室町時代 (1392-1573) 到元祿時代 (1688-1703) 日本刑事司法的殘虐或許是由內戰引起的嚴酷的社會規律化的部分表現。到平安時代，人們的處事方式就和緩多了。G. B. Sansom, *Japan* (見註 15), S. 412f., 引文見 S. 412.
- (225) 常出現的局部農民起義多會被無情地鎮壓，此外由於長期的和平以及 18 世紀時社會關係的轉變，人們“已不再隨意地進行大規模的屠戮了”。G. B. Sansom, *Japan* (見註 15), S. 450 (引文), 506f.
- (226) 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給他的修會同事寫道，要按照日本人的清潔和禮貌標準行事。J. F. Moran, *Japanese* (見註 14), S. 54.

(227) 請參考 F.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見註 13), II, S. 101f.

(228) 歐維士 (1547) 的觀察, in: J.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64.

(229) 請參考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56 - 在處理自己的家庭分歧時也要有第三方充當調節人 - 與斯多葛派的對比 ebd., S. 234.

(230) 對於中國人，著名的德美籍中國學家艾伯華 (Eberhard) 在這一問題上持這一態度。請參考 Eberhard, Wolfram, *Über das Denken und Fühlen der Chinesen*, = *Themen-Reihe der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Heft 39, o. O. 1982, 此處 S. 19ff. 關於這一方向的較早的研究: Granet, Marcel, *Das chinesische Denken. Inhalt - Form - Charakter*, hg., eingeleitet und übersetzt von Porkert, Manfred, München 1963, 1980 簡裝本。

(231) 引自 P. Kapitza (Hg.), *Japan* (見註 2), I, S. 139, 對於飲食方式的評論, ebd., S. 113ff., 157.

【譯校者說明】本文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文學院的雷立柏教授 (Prof. Dr. Leo Leeb) 的熱情幫助，在校閱的過程中也得到了慕尼黑軍事大學歷史系的戴默爾教授 (Prof. Dr. Walter Demel) 本人的鼎力襄助，在此一併致謝！本篇的部分內容曾以下述名稱發表過: Walter Demel, *Die politischen Ordnungen Japans und Chinas in der Wahrnehmung frühneuzeitlicher europäischer Reiseberichterstatte*, in: Thomas Beck u. a. (Hgg.), *Barrieren und Zugänge. Die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Expansion. Festschrift für Eberhard Schmitt zum 65. Geburtstag*, Wiesbaden 2004, S. 160-176; 同一作者, *The Images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Chine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Customs and Skills.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Cultures of the Far East*, in: *Itinerario* (Leiden), Bd. 25/3-4, 2002, S. 34-52. 後一篇的英文稿也有一個日文翻譯: ヴァルター・デーメル (中村 武司訳) 近世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日本人と中国人のイメージ: 身体的特徴 - 習俗 - 技術 - 極東の文化へのさまざまなアプローチの」頁 38-59, in: *Journal of History for the Public* 2, 2005, S. 38-59。

李雪濤譯